



Jesuits in China

耶穌會士在中國

賴詒恩 (Thomas F. Ryan, S.J.) / 著

陶為翼 / 譯

耶穌會士在中國

賴詒恩 (Thomas F. Ryan, S.J.) / 著

陶為翼 / 譯



Jesuits in China

By Thomas F. Ryan, S.J.

Translated by Tao Weiyi

目錄

- 壹 開路先鋒
7
- 貳 開闢新路
16
- 參 逐步前進
36
- 肆 修正曆法
50
- 伍 暴風雨的日子
57
- 陸 新的開始
78
- 柒 二十世紀前半葉
101
- 捌 二十世紀後半葉
113

耶穌會士在中國



壹

I. 開路先鋒

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亦即Jesuit Order的官方名稱）創立於公元1540年，短短十二年內，便有一名會士來到東方，叩擊中國的大門，那就是名聞遐邇的聖方濟·薩威（St. Francis Xavier，舊譯方濟·沙勿略），現在是傳教區的主保。耶穌會創立的首要目的，是遵從羅馬教宗的意願，將信德的種子傳播到各地。聖方濟和其他四位會士，在一年內便離開了歐洲，前來東方，履行他們的使命。

當時正值地理大發現的年代，西班牙和葡萄牙兩王國不斷擴張勢力，薩威也在幻想著為基督的信仰，贏得更廣袤的土地。「外方傳教工作」的說法，在當時頗為新奇，因為在歐洲人的觀念中，到外方傳教，便是前往「新世界」。到東方去的路徑，一是搭乘葡萄牙旗下的船隻，並且取得該國政府的特准；另一條可以選擇的途徑，則是難行而

多險的陸路。有些傳教心火旺盛的會士，竟克服了陸路中的種種艱險，達到了他們的目的，義大利的方濟會會士孟高維諾（Fr.



依納爵派遣薩威到海外拯救人靈。

Giovanni da Montercorvino) 即是其一，他在兩個半世紀前抵達了北京，立即以教宗代表的身份，受到忽必烈汗的曾孫帖木兒的款待。其他方濟會會士也加入他們的宣教行列，按照他的路線陸續抵達。孟高維諾被任命為北京教區的總主教，在帝王庇護之下，教務拓展的前途似乎甚為光明；但結果卻有兩件意外之事阻止了它：一是因蒙古（即元朝）的滅亡所引起的騷亂，一是因陸路交通的艱險無法克服。雖然派遣了一位又一位的主教，和一組又一組的方濟會會士前來中國，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抵達了目的地，甚至到了最後，竟沒有一個人獲得成功。因此，五十年後，這英勇傳教的努力終告停頓。緊接著就是中國的閉關自守政策，嚴禁任何外籍人士到中國來；於是，印度和印度支那，便成了傳教士們希望所寄的地區。

葡國政府很快就送傳教士由水路到東

方來，那時常有許多準備歷盡風險、遠涉重洋、完成航程的人。薩威就曾經在海上航行了一年的時光，才從葡萄牙抵達了印度。他是他那一組的領導人，並銜有羅馬教宗的宗座代表使命，他走遍了大半個印度和馬來半島，甚至幾乎到達了新幾內亞各島嶼；他每歸化一區，便委託其他會士繼承他的事業，自己則起身向前，從未把傳教事業視為個人的成就。他的工作是找尋途徑，做一個開路先鋒，為他人開闢道路，這乃是宗座及總會長聖依納爵委派給他的使命。

聖方濟·薩威在印度工作了七年之後，便毅然轉往日本；果然，他發現那是一塊沃田，但也遭到嚴重的阻礙，多數日人為他所說的話，及所宣講的道理大受感動；然而，他們卻認為假使中國人對此尚無所知，他們便不敢輕易相信那是真理。

聖方濟寫道：「日本人總認為中國人在德行和形而上的思想上，不僅具有極高的智慧，也有極佳的執行能力；因此，有關天主誠命及創世信仰的難題，若真是事實，為什麼中國人竟一無所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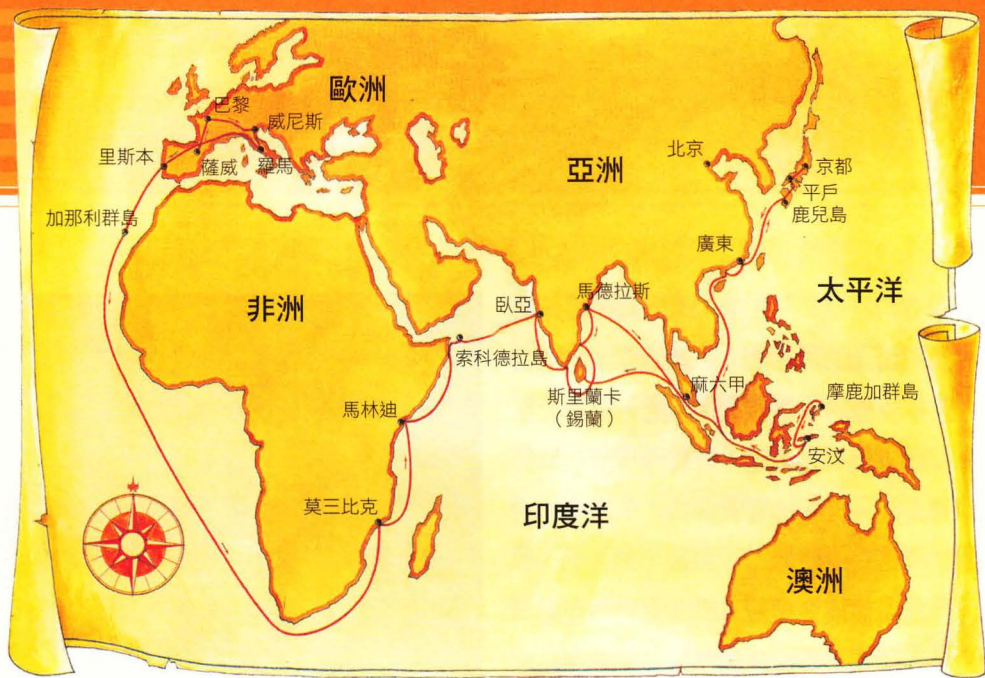
他對所面臨的難題，有一獨到的見解：先去感化中國，然後再返回日本，完成使日人歸化的工作。這一計畫看來令人難以置信，似乎根本沒有提出的必要，但他卻著手嘗試要付諸實行；他的職責便是開闢道路，那時他年方四十五歲，尚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來籌劃這偉大的事業。雖然，當時正值中國政府規定，凡企圖登陸中國的任何外籍人士，一概處死或監禁，他對此一事實卻毫不畏懼。他請求葡國駐印度的總督，派遣一位大使，前去朝覲中國皇帝，自己再以教宗代表的身份同行。他希望能以這種方式，將他的意見呈達於最高當局，同時將禮物獻給皇



日本古畫中描繪耶穌會士抵達日本的情景。

帝，叩請他更改不准外人來華的禁令，釋放拘禁於廣州監獄裡的葡萄牙人，並准他和他的同僚傳布福音。

總督認為這計畫值得一試，因為聖方濟之前也征服了其他看似難以克服的困難，因此特為他派遣了一位大使，可惜被葡萄牙一位偉大航海家瓦斯哥·加瑪（Vasco da



薩威的漫長旅程——從里斯本到日本及中國的門戶。

Gama) 的不肖之子，把這次的努力破壞淨盡。他是麻六甲 (Malacca) 的海軍司令，船隻都須在此停泊，他斷然下令不准啟航，除非此人不以大使身分前去；原因是他自己想取得這個職位，他認為此行一定收穫豐碩，而那正是他的人生目標。方濟所計畫並可能獲得中國皇帝批准的任何希望，都被阿瓦勒·加瑪 (Alvaro da Gama) 破壞殆盡，因此方濟決定獨自前往。

他既無法獲得政府的公函，唯一的途徑便是乘一艘中國船，設法偷渡入境，葡國商人便經常利用這種方法達到目的。當然，萬一事機洩密，被當局逮捕，會被拘留監禁。他特地雇了一個私梟來引路，言明從上川接他入境，這廣東外海的小島，正是商人和私梟的聚集地。臨行時，他給他的葡國友人留了一張便條，感謝他資助自己前進中國的費用，並說不拘他是否成為廣州獄中囚犯，或

踏進富麗堂皇的北京宮殿，都盼望能再見到他。

公元1552年秋，他在上川登岸，遇到了一位誠實的中國青年，跟隨他做他的通譯。在等候前往廣州的船隻時，他突然發起高燒，臥病上川，但他仍然振作起精神，計算著距離11月19日船到的日子。那天終於盼到了，他夾著一捆單薄的隨身衣物，和幾本應用的書，等在海邊，不住地向海外眺望；但



遠處海岸上的教堂，即薩威在上川島辭世之處。

直到望眼欲穿，始終不見有船隻的影子。夜幕低垂時，他終於明白苦苦期待了兩個多月的希望成了泡影；他感到消沉和沮喪，病勢就更形加深，兩星期後便溘然長逝。臨死前，他遙望著久已嚮往的中國大陸，淚眼汪汪的向她投了最後的一瞥。

縱然聖方濟·薩威的這種奮鬥精神，對我們說來似乎只是一種美夢般的幻想，但他的耶穌會士弟兄們卻另有看法，沒有一個人責怪他魯莽，甚至更有許多人自願步他的後塵。三年後，便有一位葡籍會士巴萊多神父（Fr. Melchior Nunez Barreto），向這條路上多邁進了一步，至少已抵達廣州，初次踏上了中國的領土，為他似乎是一個天賜的徵兆。在他去日本——那已被方濟·薩威開闢，而教務正在進行中的島國——的途中，颶風將船隻吹到了中國的沿海，他在方濟葬身之地上川登陸。去日本的計畫，因此

而擱置下來。這期間，他肩負了一項新的使命，即前往廣州，為營救被監禁的葡商教友奔走，這樣的事，中國政府偶爾也會應允，結果巴氏成了第一位在中國境內，能通行自如的神父，並且使得若干教友獲得釋放。一個月後他陪同他們離開了中國。由於他的成功，使得他再度獲准進入中國，次年他至少又到中國兩次，居留了數月之久。不過，他傳教的對象，只限於葡國的水手和兵士，他

卻仍懷抱極大的信心，希望能夠在廣州開闢一個名副其實的傳教區。然而，到日本去的船隻已為他備妥，他必須繼續完成既定的使命，因為派遣他的主旨，是前往日本，而不是中國。臨行前，他特留下一名葡籍耶穌會修士斯德望·高斯（Bro. Estevao de Goes），在廣東省南部學習中文，並與日後前來中國的傳教士保持聯繫。但六個月後，高斯修士死了，因此這聯繫也就無形中中斷了。



聖方濟·薩威（Francis Xavier, 1506-1552, 舊譯為方濟·沙勿略）在上川島之墓，其聖髑置放於印度臥亞。

緊接著的幾年中，其他的耶穌會會士抵達了中國，一路上雖經歷了不少危險，但絕不能阻止他們前進的雄心；因為他們認為，既然葡國的商人能夠和中國人民建立關係，那麼身為傳教士的他們也可以做得到。因此，他們艱苦奮鬥的精神和勇氣永不衰退，並且獲得歐洲長上們的全力支持和鼓勵，這種精神上的鼓勵，使他們精神倍增，克服一切困難，勇往直前。在聖方濟·薩威

去世的前一年，有一位名叫方濟·博日亞（Francis Borgia）的西班牙貴族——甘底亞（Gandia）公爵，放棄了他的爵位和財富，棄家修道，成為一名身無長物的普通耶穌會神父。他以前的地位和出色的人格，使他的一言一行都具有特殊的權威。大約就在這時，他往訪葡萄牙，那時東方——從印度到日本——是屬於葡國的傳教區，在那裡，他得到有關打開中國門戶的第一手資料。於是，他公開宣稱，在中國從事傳教事業，有很大的希望。這在耶穌會中激起了一股熱潮，神父們的請願書，由四面八方呈遞到省會長面前，其中有來自年輕的，也有來自年老的，都不約而同的要求批准他們去負起這項艱鉅的使命。

博日亞所以抱有這種希望，是因獲知葡國在澳門的交易市場上，有了新而重要的地位。中國對西方來的商人，一向都以敵視的

態度相對，但為了報答葡國政府協助他們擊退在沿海蠢動的海盜，特准葡國在這廣州半島的尖端，建立一個交易市場。起初尚在半島的狹地建立一道關卡，除了每年兩次在衛兵監視下進行的交易之外，其他時間何人也不准通行。但過了不久，關口日益擴大，監視也逐漸放鬆，於是，葡萄牙人與廣州當局的接觸日漸頻繁。

到了公元1562年，葡國要求將澳門除了做為商業交易之外，並可供作外交上的活動。當時即組成了一個代表團，前往廣州陳情，結果延至1565年方才抵達。在這個代表團中，有一位耶穌會會士，方濟·培萊思（Francisco Perez）。他抓住此一機會，向廣州官吏要求留在廣州，不做商業交易，而專門從事於講授學識；但是，官吏以嚴禁外籍人士留駐中國的法律作為答覆，並告知他務在年底前離去，培萊思神父無奈，只好返



耶穌會士以澳門作為前進中國的門戶。

回澳門。到了澳門，他建了一座居所，幾年後，這居所變為保祿學院。神父們在澳門仍繼續為葡國居民和旅澳外籍人士，進行傳教事業；並期盼他們渴慕已久的日子及早來臨，好能實現他們踏上中國領土的願望。

三年後，又有兩位耶穌會會士，黎伯臘（Fr. Ribeira）和黎耶臘（Fr. Riera）蒞臨澳門，銜著總會長萊內斯（Fr. Laynez）的命令，想竭力將聖方濟·薩威的傳教理想，及早在中國土地上實現，結果再次受到挫折。差不多同一個時期，有另一位耶穌會會士，以中、日兩國主教的身分前來，他是第一位有此職位的人。

他的故事是相當離奇的；原來耶穌會顯願會士，都曾發過誓願，拒絕接受教會內的任何榮譽職位，除非有教宗的特別任命。1555年，葡王曾奏請教宗派一名耶穌會會士，出任衣索比亞的宗主教，教宗不顧聖依納爵的抗議，准其所請，同時並提名另外兩位耶穌會會士，出任宗主教的輔理，且祝聖他們為主教。其中一人是加奈羅（Bp. Melchior Carneiro），後來因故無法去衣索比亞，而被派往印度，兩年後，又被任命為中

國和印度教區的主教；他本可以上書教宗，隨時請辭此職，但為了熱愛中國，為了聖教會著想，無論如何，他也要設法接受此一任命，俾能到達廣州，完成傳教的使命。

這種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感人精神，持續了一代又一代，但有一個非常明顯而切要的事實，便是首先必須開闢一條新路，才可能獲得踏上中國領土、進行傳教事業的希望。幸而到了1574年，范禮安神父（Fr. Alexander Valignano）離開歐洲，到東方來視察耶穌會的教務時，把這條新路打開了。



貳 II. 開闢新路

聖方濟·博日亞對東方傳教區的心火，我們已約略陳述過了。公元1565年，即聖方



濟·博日亞（Francis Borgia, 1510-1572），在年輕的利瑪竇入會時，擔任耶穌會總會長，對於東方的傳教事業十分熱心。

濟·薩威逝世後的第十三年，博日亞被選為耶穌會總會長，他是耶穌會的創立者、也是他的知己——聖依納爵的第二位繼承人。他傳教的熱忱，絲毫不受他本會的傳教範圍所限。公元1568年，在他與教宗聖碧岳五世的會談中，他曾建議成立一個特別聖部，主持並協助尚未接受信德者的歸化大計；在當時，教會事業皆操諸在當政的俗人手中。這項建議促成了以後傳信部（de Propaganda Fide）的成立，專管外方的傳教事宜。有關中國，他所做的一樁最有價值的事，便是收錄范禮安神父入會，雖然他未能親眼見到最後的成果。

這位卓越的青年，是當代教宗保祿四世一位摯友之子。他榮獲了巴度亞大學（University of Padua）法律博士的頭銜後，便在宗座法務部，開始了他輝煌燦爛的一生。然而，在二十七歲那年，他卻毅然辭去

該職，進入了耶穌會。因他以前的學識和才華，在會中不久便晉升為司鐸。五年後，任羅馬初學神師的助理，在神師缺席時，常代理院務，這便註定了由他接納年僅二十歲的青年法律學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入初學。這是一次極有意義，也頗富歷史價值的晤談。他們二人的生命從此連結在一起，若方濟·博日亞能夠預視及此，一定感到異常喜悅和興奮。

年輕的利瑪竇，在完成初學之前，便聽說范禮安神父在學校做了一年院長後，曾請求前往東方去傳教的事；他的願望獲准了，並且不只以傳教士的身分前去，更正式被任命為教區視察員，巡視整個東方地區，對今後該地的教務發展給予指導。他於1574年，由葡京里斯本啟航，直達葡屬印度的首都臥亞（Goa），1577年，他又啟程前往日本。在航行中，遭遇不測的風險和海難，是司空見



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神父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又傑出的民族，應當使用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傳教法。

慣的事，尤其在海運初興之期，更是難以避免；他所乘的船被迫在澳門入塢修理，因此他在澳門逗留約十個月之久，等待再一次揚帆出發的時刻。這耽延是出於天主上智的安排，他雖早已聽說企圖進入中國傳教是件非常棘手的事，如今他得以親眼見到同會弟兄

們所處的困境，他們已感到消沉和失望，且異口同聲的說：已沒有更進一步的方法可想了。

范禮安是一個非常達觀的人，對一切事都抱著樂觀的看法，這是他初次直接與東方世界接觸；他奮力研讀有關中國的一切習尚，對所聽到的一切有關中國的風俗習慣，以及短期往來所獲得的經驗，印象極為深刻。在他給歐洲友人的信中，曾稱讚道：「中國人民的確是偉大而高尚的民族。」最後他終於找到了一個結論：傳布基督信仰和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失敗原因，不外是所採取的方法和進行的態度失當。

在給派遣他的總會長的一封信中，他寫著：「如要打開這一進路，唯一可能的方法，是改變目前在各國傳教區所採用的方法。」他相信中國人既然敬重學術，樂於採

信任何光明正大，且較他們文化水準高的知識，因此，一定會打開心胸接受基督信仰。於是，他訓令派往中國傳教的會士，會讀、會寫及會說中文，為首要條件；並盡量熟習中國的禮規，和中國的國俗民情。

他對當時在澳門的那些教士並不懷抱太大的希望，因為他發現他們與他的理想全然背道而馳。因此，他寫信給臥亞的耶穌會省會長，請他將年輕的義籍神父費拉禮斯（Bernardino de Ferrariis）派來。至於他為何要選擇此人，及為何未獲所請，並沒有詳盡的記載，但省會長卻給他派來一位，他認為極佳的替代人選——羅明堅神父（Fr. Michele Ruggieri），羅神父也如范禮安一樣，在進會前曾榮獲法學博士學位；在他的工作地——印度的漁民之間，顯示他具有擅長學習語言的才能；他於范禮安神父離開兩週後，抵達澳門。范禮安離開前特別為他留



范禮安神父主張要全面浸淫當地文化，不只是在宗教禮儀上使用當地的語言文字，更要深入當地的文學、藝術以及文化各方面。

以上是「聖母領報」的歐洲與中國的版本。



下一道指示，勉勵他必須學好中文。

羅明堅專心於這項新的任務，儘管在澳門的其他神父沒能給予他鼓勵。在澳門的神父並不多，主要的工作是在軍營和商人之間。他們要羅明堅也加入他們的工作行列，

對於進入中國傳教一事，早已認為是件不可能的事了。但是羅明堅卻不顧一切，埋頭苦讀；只是他發現學習中文，與學習印度的方言有著顯著的不同，他學習中文的成果並不理想，不過他對中國的禮俗卻有獨到之處。因此，雖然他的說話能力不強，卻也結交了

不少中國朋友。他曾為這件事寫信給在日本的范禮安神父，建議將與他同時抵達印度，並在那裡晉鐸的利瑪竇派來協助他。

范禮安神父准其所請，並寫信給印度，命利瑪竇和與范禮安同時從義大利前來的巴範濟神父（Fr. Francesco Pasio），一起動身到澳門，然後巴濟範神父再由澳門隻身前往日本。當時書信的傳遞曠日廢時，結果范禮

安神父竟先他們兩人返抵澳門。

在這段期間，羅明堅決心要找出一條到中國去的新路線，他請求隨從每年兩度赴廣州進行交易的葡商一同前去，這一願望就在他抵澳後的第二年實現了。在這一大好機會中，他在每件事上，都小心翼翼的注意中國的禮規，這是葡國商人從未曾留意的。他這種彬彬有禮的舉止，立即被中國官吏注意到，所以在第一次會面後，便請他在每一次接待外籍人士的場合，或交易市場上出席。

隔閡終於打破了，次年，在他第二次到廣州時，他便受到普遍的尊敬，因為人們已看出他並不是有銅臭味的商人，而是一名外國學者；因此在他被引見給官方人士時，特准其站立而言，其他一般外國人都必須下跪。等到他第三次重臨廣州時，便有不少的文武官員，前來參與他的彌撒。



蕞爾半島澳門，距離中國只有幾步之遙，由葡萄牙的商船和商人占據，在那裡自成一個世界。

這樣的進展，在范禮安由日本返抵澳門時已是事實，這次來澳門不只是路過。他見到他在日本所提倡的這一新路線果然收效，便索性大刀闊斧地撤換澳門的院長，因為他過於消沉又無生氣。然後籌劃如何在那裡建立一個向中國邁進的新組織，這與周旋在軍人和商人之間的傳教工作迥然不同。

不久，他便清楚地相信新方法將會獲得成功。麥哲倫（Magellan）發現菲律賓群島時，是在西班牙王室的統治之下，因此而把它立為一個新教區。1578年，又派來一批西班牙耶穌會會士，到菲島協助在那裡工作多年的老教士。這批人之中有不少人想要把信德的種子帶到中國，急欲獻身於中國的歸化事業；他們經由福建抵達廣州，但到了廣州後，卻被廣東當局視為非法入境，侵害了自澳門到廣州某些人士的權利。兩廣總督坐鎮肇慶，裁定將他們遞解到澳門，交與澳門



1580年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乘船由珠江抵達廣州。

的長官和當地的主教。范禮安特遣羅明堅代表主教前去迎接，並聽取他們被遞解出境的理由。這位年輕的主教代表，溫文嫺雅，甚獲總督的好評，因此他返抵澳門不久，便接到了這位總督的正式邀請，函請他立即到肇慶，並可在那裡永久居留。范禮安神父即刻打發羅明堅前去，還特別選派了剛從印度來的巴範濟神父與他同行。到了肇慶，他們被奉為上賓，總督特別撥給他們一座佛寺，作

為他們的住所，並經常前來拜會他們，而且還送給羅明堅神父一幅中國畫卷。

可惜的是他們居留的時間太短了，事出於總督因故失寵；當他被召返京受訊時，他認為最好請那兩位神父立即離開肇慶，以免橫生枝節，因此他們又悵然地回到澳門。抵澳後，羅明堅神父又上書給廣州當局，請求協助；不久，他們的請求獲准了，當局並撥給他們一塊土地，作為建造住處和聖堂之



羅明堅是第一位永久居留中國的耶穌會士，親眼所見中國河邊的村莊風情。

用，但此時巴範濟神父已去了日本，因此只好派方才抵澳的利瑪竇神父，與羅明堅一同前往，1582年8月9日是值得紀念的一天。因為由范禮安神父決定了中國傳教的新路線，由羅明堅神父首先施行，最後是由利瑪竇神父達至完全的成功。從這時起，利瑪竇便成了耶穌會在中國方面的一位主腦人物。

如上所述，利瑪竇是由范禮安收錄為初學修士的，並對他在羅馬學院中有著顯著的進步感到滿意。范禮安對利氏的注意可能持續著，因在他來中國之前，就在利氏的家鄉——瑪賽拉達的學院任院長，他必常見到利氏的家人。在羅馬，利氏的數學也非常引人注目，他受教於馳名國際的德籍耶穌會會士柯拉維（Fr. Clavius），柯拉維是刻卜勒（Kepler）和伽利略（Galileo）的同事和好友，並且是西洋新曆法的主要負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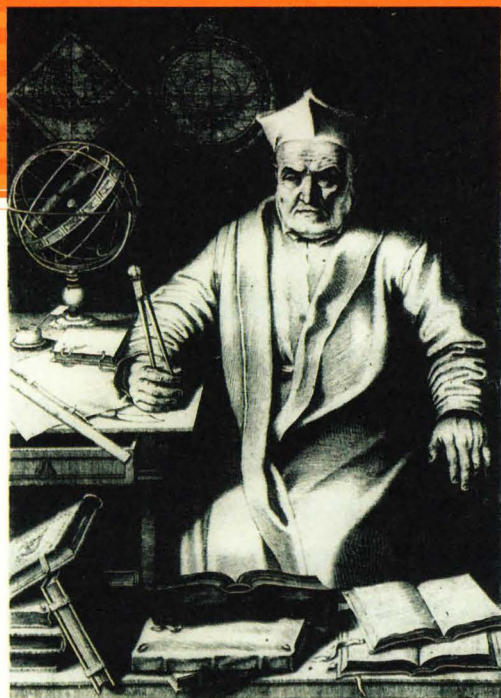
羅馬學院（圖右），年輕的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此接受哲學、神學和科學教育。

利氏也具有實務上的天賦，由他所製造的日晷儀及觀象儀，頗具成就；他還發明了鐘表和機械零件的構造，凡是機械方面的原理或構造，他都有特殊的處理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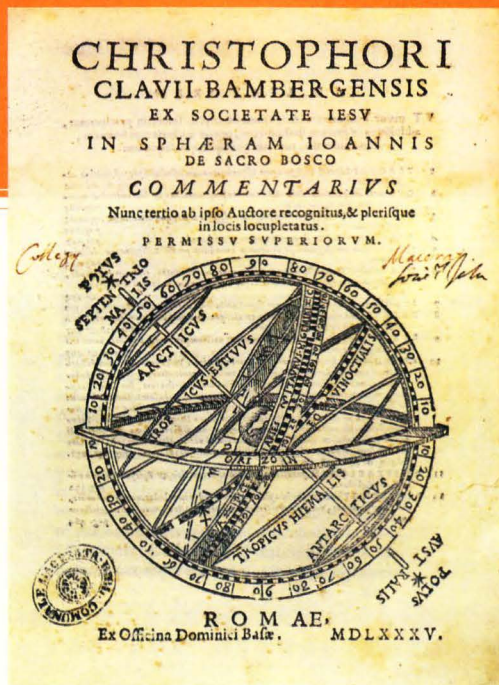
當他完成了神學的全部課程之後，又發現他對這方面的稟賦也頗強。當時教會中最偉大的辯論家、號稱「異教剋星」的羅伯·伯敏神父（Fr. Roberto Bellarmino）——日後升任樞機，死後列入聖品且封為聖師——便是利氏的神學教授。利氏曾由羅伯·伯敏那

裡學會了辯論學，和清晰的教理講述法，在他日後多年的傳教生涯中，都切實地加以應用。大家對這位年輕有為的學子，都抱著莫大的希望，咸認他的前途似錦、事業輝煌，將來定能成為一名教授。但在他的內心，卻早已嚮往著東方的傳教事業了；甚至他的請求，在尚未晉鐸前便已獲准了。目前唯一的工作，只剩下學習中國語文，然後與羅明堅神父同時前往肇慶。

羅明堅和利氏的年紀都很輕，羅氏約四十歲，而利瑪竇只有三十歲，多年以來兩人便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友誼；而且兩人的志趣也十分相投，並對「中國問題」——將基督信仰帶給中國——的看法也全然一致。羅明堅把他的心得完全傳授給利氏，指導他應該如何與中國人交往，並為他介紹在學術上對他有所幫助的人士。兩人并肩苦讀了多年，利氏對學習中國語言的天分非常驚人，



CHRISTOPHORVS CLAVIVS BAMBERGENSIS E SOCIETATE IESV ÆTATIS SVÆ ANNO L XIX.
 Franciæ Villanovæ In R. R. uq. Annarum. Cum privilegio Summi Pontificis et Superiorum auctoritate.



利瑪竇在前往中國之前，接受了極為完整的科學訓練，馳名國際的德籍耶穌會士數學家柯拉維（Clavius）是利氏的教授之一，他也是著名科學家刻卜勒（Kepler）和伽利略（Galileo）的好友。

進步迅速，並在當地和往還的學術界人士中，結交了不少中國朋友。范禮安還派給了他一項特殊的任務，讓他學習適應中國人的生活，研習中國的國俗民情以及國家的政體等。因為范禮安相信迄今為止，外國人眼中的這個國家和人民，完全是不正確的。他深知要把基督的信仰傳進中國，必須對當地民情政策完全了解。

這項任務隨利氏的語言程度而得到了進展，學習語文是他基本工作，最後他竟編印了一本約有三十頁左右的小冊，專論語言進修和文化交流，是從未有過的一本研究中國文化的依據之書，由此可看出利氏對工作是如何的認真。書中他指出中國的文化是自成一派，與西方全然不同，並特別指明這種差異偏重在哪一方面。他也分析到中國的政府

組織和政策的施行、人民的哲學思想和宗教信仰。他發現其中有不少值得西方人士欽羨和效法的地方。在各方面他都表現了對這個民族的敬佩和愛戴。目前他居住於這一偉大而優秀的民族中，極力說明若不親身去理解中國人的思想，和不切身體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東方與西方間的鴻溝，將永遠無法填平。

他在肇慶花了六年的時光，專心研究中文，和羅氏度著非常艱苦的生活。起初，他們尚有幾位朝中的朋友，至於當地的平民，他們一個都不認識，經常在街上遭受譏笑和凌辱，這在當時來說，卻是非常自然的現象。然而在學術界，利氏的朋友卻如雨後春筍般的激增，他的中國話很快便在他們中間運用自如了。加上他天生有一副和悅的儀容，易於接受一切必須的禮節；他還帶來了許多書籍，並且經常寫信向歐洲索取，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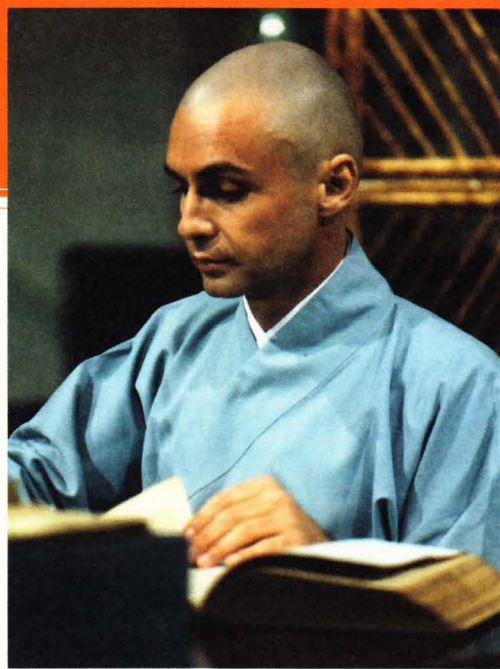


利氏自己繪製更為準確的世界地圖，在這張1600年繪成的地圖上，為了滿足他的中國朋友們，他將中國繪置於地圖的中央，以符合「中」國的意義——居於中央之國。

此各種書籍源源不絕。其中有不少書裝訂得十分珍貴大方，抱著好奇心前來參觀這些書的中國學者，對他們非常羨慕，詢問之下，知道它們是包羅萬象的科學叢書，他們才發現在西方的國家，也有著意想不到的學術，這真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那些書籍可分為數學、天文、科學、宗教和哲學等各類，利氏竟可隨意講述其中的一類。另外，他也帶來了不少西洋畫，都是天才洋溢的藝術傑作，中國的學界人士，個個都如西洋人見到中國畫時一樣的深感興趣，並大為驚

異。還有天文儀器，日晷儀及觀象儀，鐘表和其他機械零件等，這一切都引起了中國人的興趣。其中尤以地球儀，最令中國人不可思議，凡見到它的人都萬分詫異，且大惑不解，因為當時許多人並不認為地球是一個球體。這樣一來，更激發了利氏的靈感，於是他埋首繪製了一張世界地圖，把中國的所在及其在世界上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顯示出來。既然中國人認為他們的國家是居於「中」，索性就把它繪置於圖的中央，這樣更能使中國人感到高興。這張地圖後來曾一再地被翻印，對中國人的地理概念，有不少助益。但其直接的用意，是希望中國人能藉此知道來自葡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人士，他們的國家與此地的距離，進而打破他們被侵略或被征服的恐懼心理。

歲月不停的流逝，不久人們都知道肇慶有一位來自西方、學識淵博的賢者，他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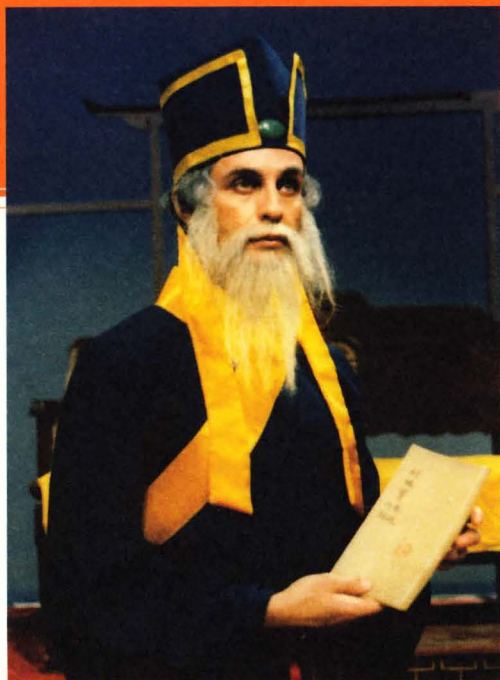


利瑪竇於1582年抵達澳門，隔年赴肇慶和羅明堅會合，初時他們著僧服、剃光頭，作和尚的打扮；圖為丁松筠神父在光啟社所拍攝的電視節目中的劇照。

知他為何而來；他的回答始終是玄妙的，他說他是由於景仰中國悠久的歷史與文化，希望能從中多獲得一些知識，並把西方的學術和一些有關神的道理貢獻出來。很早他就建了一座小堂，並請人們去參觀。最初為了教人們易於了解他們來華的主要宗旨，是為傳揚宗教，故此他和羅氏都穿起僧衣，以便教人們識別。但幾年後，他們發覺這辦法並不明智，因為當時肇慶有一座寺院，寺中僧侶

的學問與道德並不高妙，反倒受人輕視。接下來幾年，他們經過不斷和范禮安神父磋商、討論之後，決定改穿與學者相同的服裝——絲袍與儒帽；這種裝束，深受和他們接觸的學者和官員們的讚許。

在那些年中，這兩位神父與澳門方面保持聯繫，其中有一段時間，曾有另兩位神父前去協助他們，但在一次新的事件發生時，他們只得撤離了。那時，約有一百多位有影響力的地方人士，要求驅逐在肇慶的外國人，利氏的友人力加反對，因此他獲准居留，事實上也是很明顯的，只有他才享有當局的特權。於是范禮安神父決定遣羅明堅前往羅馬，向教宗陳明現今的情勢，並懇請他派遣大使到中國。羅明堅走後只剩下利氏一人，一年半中四位教宗的死亡，延擱了這一使命的進行，最後則是利氏認為時機並不相宜。他堅信要使中國接受基督信仰，務須由



12年之後，利瑪竇放棄僧人打扮，改穿儒服；圖為丁松筠神父在光啟社節目中的劇照。

內部發揮影響力，絕不是靠著外來的力量。在歐洲，羅明堅的健康日衰，無法再回返中國，一切的努力和成就唯有依賴利氏一人了。

然而，很短的一段時期內，在羅明堅離去不久，兩廣總督逝世，立時有新人繼任該職；前三任都明令准許利氏居留，但這位新總督卻要立即採取行動，將他驅逐出境。但

以利氏善辯的才能，及了解如何與官方周旋之道，果然說服了新總督，把驅逐出境改為遷居到另一城市。因此，他與另一位隨從他的麥安東神父（Fr. Antonio d'Almeida），遷居至廣東省北部的韶州。

在這裡必須再重新開始，利氏訂立了新的方向。他要致力於中國的古典文學，以便能運用他所學的中國文學和哲學，為宣揚基督教義而辯論。當時有麥安東神父，還有兩位自願申請入會的中國人士——日後成為極重要的輔理修士，利氏就此開始安心讀書。他攻讀了六年，為日後的效果頗大，但立即的成果，是天主教護教學的中文著作《天主實義》；數年前，羅明堅神父雖也寫過中文教理的講解法，但這是第一本為知識分子所寫的書籍。最初流傳的是手抄本，日後經官方許可再版了很多次，曾廣傳於士大夫階層，具有古典文學之特質。這顯示了利氏

對中國哲學的高深造詣，和對儒家思想的巧妙分析。對孔子的學術，他採取了同樣的方法，一如早期教會的教父利用希臘哲學為接觸點，引導探尋者趨向教會信德的真理。

他在士大夫階層和學者中，使若干人歸化，但他並不急於增加歸化的人數，他認為他的使命，是使朝廷接受基督信仰，認同它是良善的，且值得鑽研的；幾時到達了這一步，歸化的新紀元便算正式開始。他打算直搗中國的心臟，迫不及待地渴盼時機的到來。到了1595年，在他的貴族朋友中，有一位兵部大臣，被召回京以商討阻止日人進犯之對策，他請利氏與他同行。在韶州，他們的居處雖小，卻十分安定，情況非常良好，另外一位耶穌會會士代理他的職位。從那時起，便有更多的耶穌會會士以那裡為永久的居所，維持著利氏開創的一切志業，指導他所感化的信徒，並採用利氏的方法，逐步施

行。

與利氏同行的那位大臣，只能帶他到達中國的第二座大城——南京。他在那裡遇到了不少顯要的朋友，並受到他們熱誠的款待，他希望能暫且在那裡住上一段時間，但在戰爭的氣氛中，沒有一個人勸他作居留的嘗試。因此，過了幾個星期之後，他又返回南方，抵達江西的省會——南昌，那裡是學術界人士的集中地。他又在南昌度過了幾年，開始他穩定的傳教事業，在一群習慣聚會辯道的學者中傳教。利氏經由朋友們的介紹，打進了這個圈子，不久便和他們相處得十分融洽，還有很多人到他的住所拜會他。有一天，他的一位極有地位的朋友要進京，行前曾到韶州探聽利氏的所在，並且特地派遣一位使者到南昌找他，邀他相攜進京。利氏留下兩位耶穌會會士代理他的職務，與那位朋友踏上了進京之路；他苦苦期待了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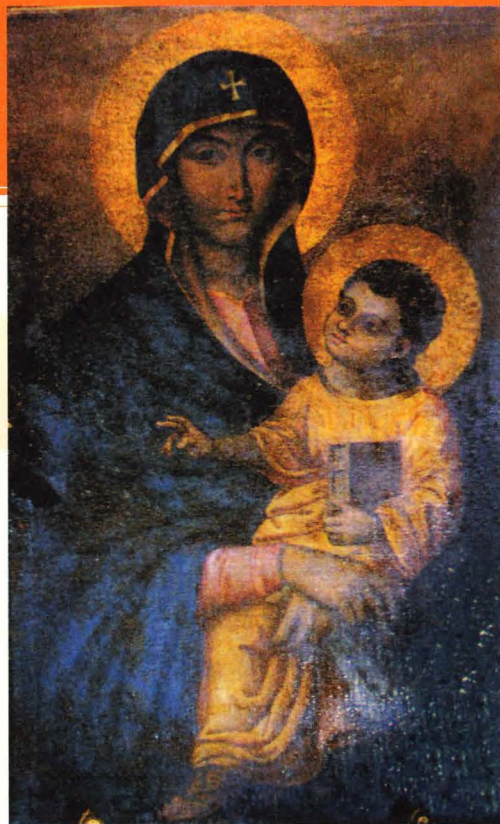
南京古城門，它是中華帝國的第二大城；在這兒，利瑪竇認識並歸化了徐光啟，他將是日後極具影響力的中國天主教徒。

年的時機，終於來臨了。

結果在他們前往北京的途中，又耽擱了五年之久，但這五年卻有極大的收穫，大部分的時間是消耗在南京。在高官和學者中間，現在他已有很多朋友，他曾頗有自信的說，在中國十五省中的十個省分，無論走到哪裡都會遇到他的朋友，其中有些是因為他聲名遠播，間接認識的。譬如說，他剛剛

抵達南京不久，有一名進京接受高位的大臣，臨行前收到許多親友贈送的禮物，其中有一件便是利氏的地圖，是南方的一位總督送給他的。他與有榮焉地出示給人們看，當時有一個人看了地圖說，那位繪製這張圖的外國學者，如今就在南京。這位大臣立即召見利氏，這件事迅速傳遍全城。日復一日，各類的學者都前去拜會這位耶穌會會士，其中有哲學、文學和數學的學者，為了歸化他們的辯論比以前更加頻繁了。利氏和同行的另一位耶穌會士——郭居靜神父（Fr. Cattaneo），在長途的旅程中，大部分是乘船，並把時間花在編輯一些有關中文文法，和羅馬拼音及書寫的方法上，這為後來學習中文的人有很大的幫助，也是日後傳教士所編輯許多類似書籍的起始。

在南京的這段時間裡，未來的相國徐光啟終於皈依了聖教。那時他方才開始他的輝



17世紀羅馬所謂「聖路加的聖母」畫像的複製圖，極類似利氏獻給皇帝的禮物。

煌生涯，隨後一路高升，終於貴為相國，是朝廷中最高的官階。他的個性溫雅，是一個卓越的學者，更是一個極虔誠的天主教徒，由於他的影響，使教會也增光不少，教會的成員也自然逐漸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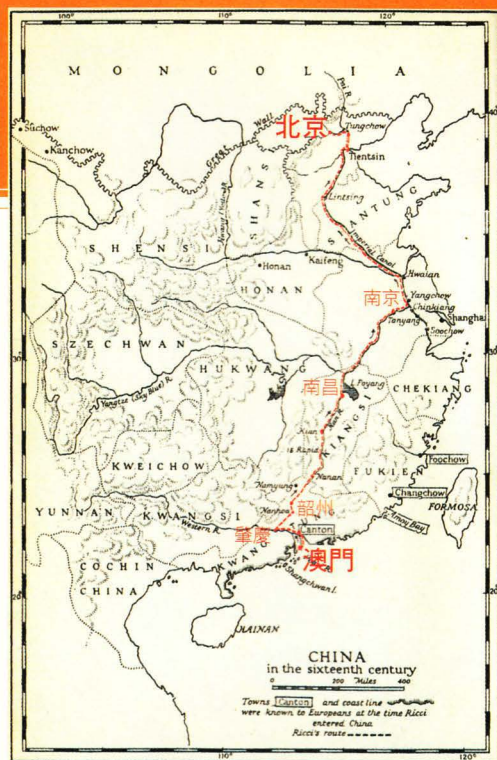
公元1601年1月24日，利氏與另一位西班牙籍的耶穌會會士龐迪我神父（Fr. Diego de Pantoja）抵達北京，把郭居靜神父留在南京的居所。他所攜來的禮物，其中包括呈獻給皇帝的一幅〈聖路加的聖母〉（St. Luke's Madonna）畫像和兩座鐘。那張畫引起了皇帝的興趣，因為那是他生平所見到的第一張透視畫，在他眼中栩栩如生（該畫日後皇帝送給了他的母后）；但利氏之所以能夠進宮，還要歸功於那座鐘，因為那鐘停了，他被召進宮去修理。他用一週的時間，教朝臣們管理鐘表的方法；同時，龐迪我也教他們怎樣演奏小鍵琴，那是他們所獻的另一件禮物；利氏作了幾首短詩，在詩中注入了基督的倫理教訓；這幾首短詩再版了很多次，並列入了中國珍貴文學作品之列。直到五月，皇帝終於頒下詔令，特准他們在京城永久居留。

那時正值明末的最後一位皇帝（萬曆）統治著中國，是他在位的第二十九年。利氏從未與他謀過面。他原本希望能覲見皇帝，由皇帝頒賜在中國傳教的許可，但他於北京落居之後，覺得已無此必要，因為皇帝不操實權，大權都落在太監手裡。他得以在北京居留只是受到了默許，不需要特准的法令。因此他和他的同伴，在這種默許之下，能繼續居留北京，並繼續在學術界中從事傳教事業。他們盡量將友善的交流擴展到每一處，



北京故宮現存與利瑪竇所帶來的自鳴鐘類似的鐘。

盡可能與中國人的生活打成一片，避免與外國軍隊和商人有任何形式上的接觸，因為中國人對他們懷有敵意。他們對當地人所珍視的信仰或習俗，絕不表示意見也不予以譴責，只是以同情和諒解的態度闡明真理，希望在他們所渴盼的皈依者心中，開闢出迎接聖寵的道路；利氏以皈依者的素質為重，而不以皈依者的數量為榮。利氏和他的同伴，見到學術界和知識分子所受到的尊敬，他們相信假如這些人領洗入教，那麼教群眾聽他們的道理便不會是件難事。這段時期利氏曾寫信到澳門，說明他決定要請皇帝御賜一個明確的恩准。但後來他表示，只要知識分子進教的人數多了，便能獲得公開實行天主教義的許可；既然在中國沒有一條禁止的法律，就可暫且擱置不理，直到需要時再決定，這便成為以後的一貫方針（九十年之後，當利氏當年所預想的情形到來之時，透過向皇帝的請求，終於得到了信仰自由的敕



利瑪竇的夢想在現實生活中耗費了漫長又曲折的19年，才從澳門到達了北京，途經肇慶、韶州、南昌、南京……

令)。利氏被任命為中國教區的會長，當他接獲這一任命後，便可自行決定他認為是最好的政策。這一項任命，表現出長上對他的看法甚為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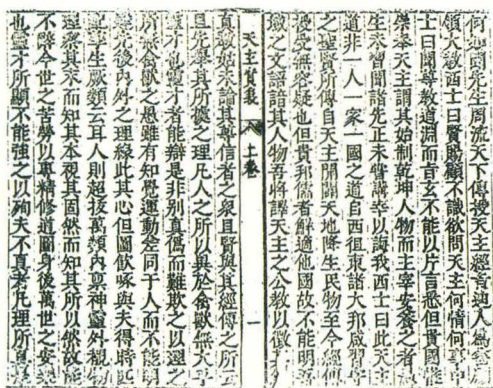
利氏足足用了十九年的時間，才能得到居住於皇城內的全面准許，並可在那裡傳

教，他深獲官方和學術界的歡迎，也因此才能把他終生所傳的信仰，講給所有的人聽。這一段時間，他們過得很安定，每天訪客盈門，他們也積極地與人往來；也寫了許多基督宗教的手冊，尤其著重於哲學和倫理方面。

他每天都在忙碌中度日，在平常的日子裡，每天總有二十多人來拜訪他，但當會考

來臨和文人聚會時期，或朝中有任何集會，四面八方的人士匯集於京城時，每天來訪的人數，大約都可上百，因為每一省都有他的朋友。他已經名滿全國，被譽為學者、奇人和西洋學者。很多人純粹是出於好奇前來拜訪他，但他卻抓緊每一個機會，向人們介紹他的基督教義，不拘任何人來看他，他都同樣的歡迎，他的態度和善溫文，到處都能結交朋友，尤其是在有禮儀之邦美稱的中國人中間。

在這段時期，利氏寫下了許多著作，其中《二十五言》（*Twenty Five Sentences*），是一本有關天主教倫理教誨的概論；《畸人十篇》（*The Paradoxes*），是講述有關時間的價值、邪惡問題、貪慾的危險、為將來生命做準備的重要；這本書比其他的任何書籍，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但最終證明更有價值的卻是他早期的作品：《天主實義》



當利瑪竇被迫自肇慶遷居至韶州時，他終於有時間寫下他的中文著作《天主實義》，這本書深深影響了好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

(*Treatise on the True Idea of God*)，這本書在兩世紀之後，仍繼續再版，並被譯成遠東各主要的語文。他也編著了有關數學和天文學的書籍。他繪製的世界地圖，其中包含了中國，並且是第一次繪出她正確的位置，比之前的地圖更能使世界認識中國，也使中國得以認識整個世界。



利瑪竇終於得到居住皇城的許可，他花費大多數的時間和知識分子相往還；圖為光啟社所拍攝《徐光啟》紀錄片的劇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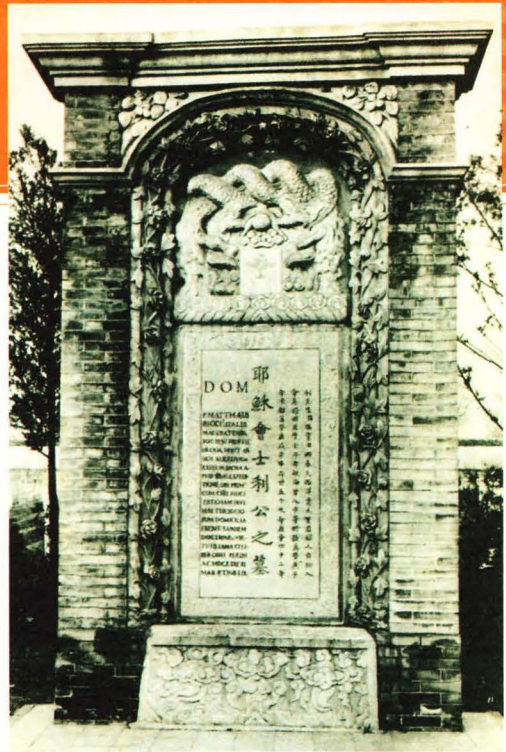


電腦模擬的皇帝居所—紫禁城全圖。自1601年起，利瑪竇可在北京居住和自由往來。而多虧他送進紫禁城的大鐘，利氏終於因為大鐘停擺而被召入宮中，但始終未能和皇帝見上一面。

利氏的工作絕不是如日後他的敵對者對他的批評——只去撫慰權力階級，也不只是局限於他的朋友和熟人。事實上他在北京的第一個皈依者，只是一個卑微的人，但此人直到二十年後過世之前，一直都過著模範的生活。由他所歸化的人還包括了在朝的官吏、皇后的姊夫和皇帝御醫的兩個兒子。在他抵達北京四年後，由他所歸化的人已超過百人。他的同伴龐迪我神父，也把他大半的時間奉獻給了他們，並設法使人數擴增。他開始去拜訪京城附近的鄉村，幾年後已有了一百五十個教友；到了1610年，利氏臨死的時候，在中國各地環繞於他所建立的四處居所和聖堂的教友人數，已接近兩千之譜。

在他病重的消息傳出之後，由各地前來探病的人蜂擁而至，直到最後他仍是振作起精神，一如往常一樣地迎接他們。他逝世以後，學者和官吏們的追悼行列，不但人數非常之多，而且每人都出自誠意。他在朝廷中最有地位的朋友，為他上書皇帝，奏請頒賜這位「建立奇功的利瑪竇——一位歸化中國的西洋人」一塊特別的葬身之地。這奏本蒙准了，皇帝詔敕在北京西城外，給耶穌會撥贈一塊土地，利氏便葬在這裡。後來京城府尹，也是利氏生前的一位知己，特別發表了一道正式的宣言，刻在利氏的石碑上，載明他在中國朝廷所受到的崇敬和光榮。

利氏一生的事業已略加敘述過了，他對耶穌會士在中國的福傳事業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那時耶穌會士已滿布於世界各地，在不同的國家採取不同的傳教法。中國，尤與其他國家迥異，因為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政



利瑪竇逝世於1610年，葬在北京城郊、皇帝御賜的墓地之中。

體、風俗等均有顯著的不同，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高貴文化的古國，在傳布信仰之前，務須先認識和了解她，這便是利氏的傳教法。今日我們要明白的是，這位先行者過逝後，他的方法產生什麼成果。

III. 逐步前進

為了使利氏開創的傳教事業獲得成功，絕大部分必須倚賴繼承者的素質。在他最後一封信中，他還特別強調：「派往中國的傳教士，不但要好，還應該具有才能，因為我們所接觸的對象，都是智慧高超而學問淵



徐光啟（1562-1633），利氏最重要的皈依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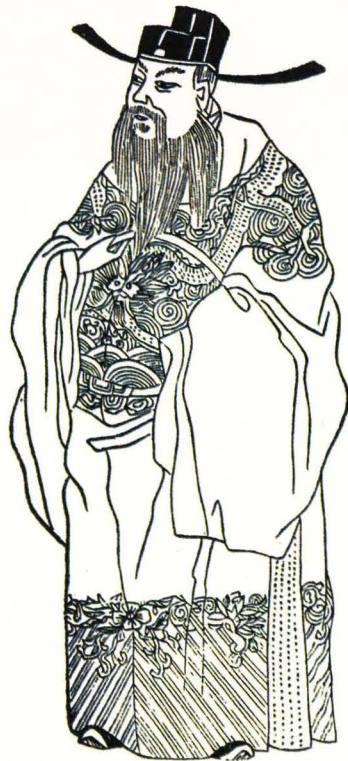
博的人。」接替他位置的人雖比不上他的才幹，但也都有才能並且忠誠，因此發展得頗為順利。受到利氏感化的兩位具有領導地位的人，以他們的影響力，也給予不少的幫助。他們兩位一個是之前提過的相國徐光啟（1562-1633），另一位也是很有地位且學識高深的李之藻（1559-1654）。利氏的繼任者——龍華民神父（Fr. Nicolo Longobardo），又勸化了另一位學界官員，即京兆尹楊廷筠，他是李之藻的親戚，曾和李氏辯論基督教義九日之久，最後終於屈服，而且到龍華民神父處聆聽教理。1613年的復活主日，他特別穿上官服去領受洗禮，不久，他的三十名親友，也都隨他領洗入教了。

這三位便是後來被譽為「早期中國天主教會的三大柱石」，他們都勸說教會要繼續發展，不久之後，在上海和杭州，也奠定了新的基礎。後來又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件

事對傳教士來說是一項新的卓越表現：公元1610年的12月，欽天監中的天文學家，把日蝕的時間預測錯誤，他們辯稱那是按照傳統的計算法算出的，他們只得將錯就錯地因循舊制。徐光啟上書禮部，懇請皇帝詔令耶穌會士貢獻一個較好的制度，並修改曆法。皇帝允准了，幸好當時正有兩位神父有能力



耶穌會士以準確的工具和可靠的測量方法來證明他們修正曆法的能力。



穿著官服的李之藻，和徐光啟一樣，同是早期中國天主教會的三柱石之一。

勝任這項工作，他們是數學家兼建築師的熊三拔神父 (Fr. Sebastian de Ursis) 和龐迪我神父。那些自認為「失去面子」的官員，卻站在敵對的一方，阻礙工作進行，但這些外籍人士，是皇帝詔令修改曆法的，乃是朝野共知的事。在不得已之下熊氏放棄了這項工作，又去從事裝置水壓機，很多朝中的大臣

都親往檢驗，並感到十分驚奇。人們請求他把水力學的理论寫出來，他果然不負眾人所託，撰寫了六卷。他又寫了另一部有關農業的書，人們奉為範本使用了許多年。

新建立的地區中，在皈依一事上，以南京最有成效，那裡的教友在熱心慈善的工作上，樹立了極好的典範。主持該地教務的高一志神父（Fr. Alfonso Vagnoni），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熱心的人，也是第一個違反利氏所堅持的間接傳教原則的人。可能是受了中國以外那些固執己見的人士所鼓動，他們認為不該把數學和天文，做為傳布信仰的工具。他在南京開辦了第一座公開傳教的聖堂，舉行教會的儀式，由於他過於注重外在的形式，而忽略了謹慎行事；另外，外界把對佛教僧侶們的批評，都歸咎於他，這事不久便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新任的禮部侍郎發起了一場運動；到1617年，禮部更發出告示，禁



一位英國畫家筆下的鞭笞之刑，一如高一志神父所經歷過的。

止傳教士在中國宣講或施行基督教儀式。

這道命令在南京嚴格執行。高一志神父和當時僅存的另一位耶穌會會士——曾德照神父（Fr. Semedo）被逮捕下獄。高一志神父被判笞刑，打得遍體鱗傷，足足休養了一個月才好。曾德照神父是一個有病的人，因此被免去了這一刑罰。兩人都被關在囚籠裡，解往廣州，驅逐出境。在北京被捕的，

只有熊三拔和龐迪我，也就是被任命修改曆法的兩位神父。他們並未受到什麼苦，反而被護送到沿海，遣離中國。隨後他們被派從事其他工作，再也沒有回到中國。在中國其他各地，法律的尺度因地制宜，但不再有人被驅逐。

那時在中國有十四位耶穌會會士，其中八位是神父，皆為歐洲人。其餘六位是中國籍的輔理修士，這六位進入耶穌會做修士的

人，正在等待長上的決定，看他們是否能夠晉升為司鐸。那時中國與日本同屬一個傳教區，太急於晉升當地的神父，會引起不幸的後果，因此決定暫時不再祝聖當地神父。過了幾年之後，准許祝聖中國神父的命令下達時，那些身為耶穌會輔理修士的中國青年，卻希望留在原位上。他們當中也有學者，他們的工作是非常寶貴的。在南京的兩位修士被判定期勞役，許多天主教徒被監禁了一段時期，並遭受笞刑。

下此子於漢西際刑律守首如
秉筆一可也
主在基督此形合台台名者在此
能保不苦究竟尚一但裁未
步免障障予亦免係字下
即家少更且是于此者廣飛甚為
形聖聖愛回語以名語之亦已味大
官同說他病之合在急者古與晚
明大後回上層任之人故至同
者未二可多全大休儀派動同人
拜禮者亦用印書也書中其書
子以以平春之應意亦寫了莫誤再將小
兼收信稿呈呈也當自茶人
兼收信稿呈呈也當自茶人
亦可也也酒所之郊居子能合我
去之也也序之在亦也何何操中
亦何我回時亦亦所應他物野為收
性性後又費子華克為兩誤住者
在尼外秋冬內方亦又辭序必亦
性四性以又三四也何一物物物
我回家是亦身自一亦亦白之
至池的方物一而金油身局并居居
小孩留下後我回來進德前居居
是油身居十分西姆折了也也

徐光啟支持教會的信函手跡。

這是中國初期教會首次遭遇到的挫折，在日本和許多其他國家，對於仇教的情況，一直都謹慎地防衛著，因為，對於傳教士和皈依者，這都是極嚴重的打擊。那些具有影響力的教友，盡最大的努力，設法廢除這項命令，或廢止它的效力；而這次挫折最立即的影響，是停止了所有傳教士在外的活動。神父們聽從楊廷筠的指示並在其保護下，利用這個時機，奮力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學。高一志神父，在他短期的放逐時間內，也從事研究古代文學，並改進他的文筆。他終於在中國古典文學上，獲得了莫大的成就，他的有關天主教理的書籍，都被列入早期耶穌會士最具成效的著作，一直為人們所採用，長達兩世紀之久。

即使在教難的沉寂中，傳教事業也未曾稍停過。公元1619年，又有277人領洗入教；那一年之前，有一位神父和一位中國修士抵

達南京，受到教友們熱烈的歡迎。他們在寓所中默默的工作，建立了新的關係，開啟了新的活動中心。在上海附近的嘉興、揚州和杭州，山西與陝西，都建立了新堂區，但只在上海蓋有一間簡陋的聖堂。在其他各地，教友每年在一間私人的住宅，祕密集會六次，望彌撒，聽神父講道理，並恭領聖事。禁令逐漸變成了一張徒具形式的廢紙，五年以後，聖教的主要仇人，已失去了力量，恐怖的日子總算結束了。在那時全中國共有十三位耶穌會的神父，他們都遵照著利氏的傳教法，耐心地為教會將來的發展做準備。

當時，明朝的國勢日衰，滿清在北方興起。中國教友在朝臣中最勇毅人物之一——徐光啟，力諫兵部派人到澳門購買大砲，他相信只有利用這種新武器，才能擊潰來犯的敵人。幾名天主教徒為使者，他們是首次被正式任命前往澳門的代表，在那裡受到禮

遇。當葡人看到他們熱心參與彌撒的態度，便認可了他們前來澳門的使命。葡人給了他們兩門大砲，雖然這兩門砲在路上被某省政當局攔截，而未能運抵京城。他們成功達成使命，可證明徐光啟堅持廢止在中國傳教的禁令是對的。

當有先見之明的范禮安神父，出任視察使，並作為利氏強有力的後盾時，已認明在各事上應遵循中國的習俗；他建議准許神父們在做彌撒時把頭蒙住，因為中國人認為在敬拜神靈時光著頭有失尊敬。這一點只有羅馬教宗有權准許，於是正式上書陳請，並派一位比利時籍的耶穌會會士——金尼閣神父（Fr. Nicolas Trigault）親往羅馬將陳情書呈遞給教宗。實際上，金尼閣神父肩負著多重使命：他是一個精力健旺並富有機智的人，他受託盡量蒐集一切有價值的書籍，尤其是關於哲學、數理和科學方面的書；蒐



這是知名畫家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的素描，描畫的是在華耶穌會士的衣著帽服，畫中之人極有可能是金尼閣神父（Nicolas Trigault, 1611-1666）。

集一些藝術作品，和其他可以呈獻給中國皇帝的禮物；促使中國的傳教區列為一個獨立的副省；除了請求准許彌撒中蒙頭外，並請求准許中國人得以領受神品，和將拉丁文禮儀改為中文。每一個請求都蒙宗座允准了，雖然幾乎所有的書籍及禮物，皆因海上的風浪與海盜而喪失；而中文禮儀須延擱到祝聖

中國神父後才准施行。過了沒有幾年，第一位中國的耶穌會神父祝聖了，但請求使用中文禮儀一事，已超過有效期限，必須再重新申請。傳信部適時成立，直接管轄一切在西方傳教區的事業，這項請求沒有獲得該部的允准。利類斯神父（Fr. Buglio）——十七世紀耶穌會最好的漢學家之一，負責將彌撒經書、日課經和禮節經本翻譯成中文，藉由中

國學者的幫助，他完成了這項工作。

金尼閣神父到歐洲的訪問，引起了西方人士對中國傳教區的極大興趣。他在旅途中，曾將《利氏回憶錄》翻譯成拉丁文；那是一部極具權威的作品，初次呈現在人們眼前，其中關於中國人民、法律、政府和習俗的詳盡敘述，使各地讀者大開眼界。他在許多歐洲國家耶穌會院中講述，引起許多神父申請到中國去傳教。實際上，有二十二位隨同他前往中國，但其中有五位在航程中因感染熱病而死亡；後來又增加了兩位（其中一位是金尼閣神父的兄弟），死在航程中的最後一站——臥亞。在那裡又必須留下七位，因為他們生病了，在未到中國之前，可以在那裡藉著養病而多多充實自己。因此在二十二人中，只有八人抵達了中國；其中兩位有極優異的表現，他們是鄧玉函（Johann Terrenz Schreck）和湯若望（Adam Schall）



早在梵二之前數個世紀，金尼閣神父呈請羅馬准許彌撒日課和禮儀中的各經文使用中文，利類思（Luigi Buglio, 1606-1682）神父所翻譯的彌撒經典即是一例，但最終仍未能使用。



金尼閣神父去訪歐的路上將利瑪竇的《利氏回憶錄》譯成拉丁文，此書在歐洲引發了一股中國熱。

兩位神父，關於他倆的事蹟，後來還要另章講述。

葡國大炮沒能按時運抵京城，使得滿清的大軍節節向前推進，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而當時明朝政府的希望，完全寄託在那種新武器上。在金尼閣神父剛回來不久，澳門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荷蘭人前來攻擊葡國在東方的屬地，以十三艘戰船圍攻澳門。

起初他們確實大有席捲澳門之勢，送了八百人上岸，只靠這八百人便能輕易取勝這可憐的不設防之城了。但那時有一位耶穌會士勃羅諾神父（Fr. Bruno），是耶穌會學院的院長，他建議葡國當局把曾經卸除的四門大炮，拖到該學院的所在地，用來抵禦敵人的侵略。當地守衛澳門要塞的司令，曾嘲笑他的建議，但也沒有阻止他去實行。四門舊炮被拖了上去，勃羅諾和湯若望兩位神父，以及另一位也在等待進入中國的同伴羅雅各神父（Fr. Rho）指揮開炮。幸運的一炮，擊中了敵方的一隻火藥桶，立時引起了猛烈的巨響和熊熊烈火，敵軍於是亂成一團，葡軍乘勢大聲高呼：「因聖雅各伯之助擊中了他們！」最後終於擊潰來犯的敵軍，保衛了該城。

這一大快人心的事，在中國與澳門同樣受到重視。當消息傳抵了北京之後，耶穌會

士的朋友，力諫將神父們召回，因為這些神父非但是有德行的人，又是最優秀的數學家，更能指導使用新武器，以對付滿清軍。耶穌會士對這樣的說法大表反對，但有人向



經過六年遭受排斥的日子之後，1623年耶穌會士又能自由地在北京生活了，他們居住在之前皇帝賜予利氏的居處，今日的南堂即建在這個位址之上。

他們保證這只是一個藉口而已，有許多在朝的有力人士希望他們回來。不久這一奏章獲得了皇上的批准，他命令尋找耶穌會會士並將他們帶返北京。想找到他們倒不是一件難事，神父們的所在地是眾所周知的。關於指導新武器的說法，不久便被證實了。有兩位神父被帶到兵部，當他們被問及：是否可以獲得葡國大炮，以及他們是不是使用這種武器的專家。神父們直言對大炮一無所知，只敢擔保一定可以取得它，並願意說服葡國的炮手同來服務，這下子皆大歡喜了。兵部批准他們在北京居留，不再和他們談論大炮，或詢問他們使用大炮的方法。

就這樣，經過了六年遭受排斥的日子，到了1623年，耶穌會士又能公然在北京居住了。那時他們一共只有三人，住在十八年前利氏所請准的處所。這一個新的自由，立時引發其他省分的傳教事業欣欣向榮，但仍

保持著固有的成規。一位領過洗的學者官吏，邀請神父中的一人到他家做客，神父得以在那裡結識其他的學者，憑藉他在文學上的修養和謹慎的中國禮節，加上他對西洋科學的知識，頗受人們的尊重，因此結識了不少新朋友，進一步使他們得以皈依。在山西、陝西和福建建立起基督徒團體，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人首先提倡，因為耶穌會神父只有十八人，他們的福傳卻在中國的十五省中遍及了七省。無論如何，這些作為先驅者的工作，獲得了成效。其中艾儒略神父（Fr. Giulio Aleni）在十年中，竟成為一位優秀的學者，而且是利氏傳教法最有力的效法者；他在山西開了教，再由高一志神父來繼承，再也不會因為不謹慎，而惹出像在南京所發生的騷動。他剛到山西時，全省只有為數不滿二十的教友，但在他有生之年，就看到了教友人數增至八千以上，其中包括有兩百多位秀才，他們有些是重要的官吏，但大多

數是一般的平民；當神父受到一般平民所景仰的人的尊敬時，與他們的接觸就變得容易多了。他把這些人分成了百人一組的教友團體，在他固定的旅程中定期去訪問他們。

在福建，艾儒略神父也是一位先驅，他在那裡也留守了十幾年。原本在那裡並沒有教友，只有官吏會邀請他，但當他抵達了幾年之後，便在八個不同的地區建立了傳教站，皈依者已達至每年八、九百人，其間得力於另一位神父的輔助。最後的成果約有九十座小聖堂，和數座大教堂，最大的一座在福州，這筆建堂的款項大部分是來自基督徒的捐獻，而他們所以肯出錢的原因是由於尊重艾儒略神父，以及他們之間的深厚友誼。

金尼閣神父由歐洲歸來之後，被派往陝西工作。他在那裡鑑別一塊不久前發現的著

名石碑，上面刻有781年，內含中國唐朝和敘利亞的文字，並有「大唐景教流行中國碑」幾個大字，這似乎意味著早期中國對基督教義的認識。耶穌會的學者們能夠證明它的真實性，因為鄧玉函神父能翻譯敘利亞文，可因此補充中文含混不明之處。最後總算推翻了「基督教是一套新鮮花樣」的老論調，因



西安發現的「大唐景教流行中國碑」證明了基督宗教在很久以前（八世紀）即已傳入中國。

為已證明在九個世紀以前，基督宗教便傳入了中國，並榮獲了當時偉大的太宗皇帝的尊崇。幾年以後，便公認這些早期來中國布道的人，是景教教徒，他們是第五世紀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奈斯多利（Nestorius）的擁護者；他們的教義中，有些被天主教會斥為異端。在中國立碑之時，他們的道理在西方早已消失了。

金尼閣神父同時兼具有作家和布道家的才能，長上決定將他由實地宣講的工作，調任為以著述傳教為主。他與中國的學者們共同研究，以期對中國文字的發音有初步的解釋；在教會專有名詞上，他所付出的貢獻也不少；並在山西和陝西兩省創建了首座公教印書館，可惜他的事業因他的早夭而中止了。

湯若望神父代替了金尼閣神父在陝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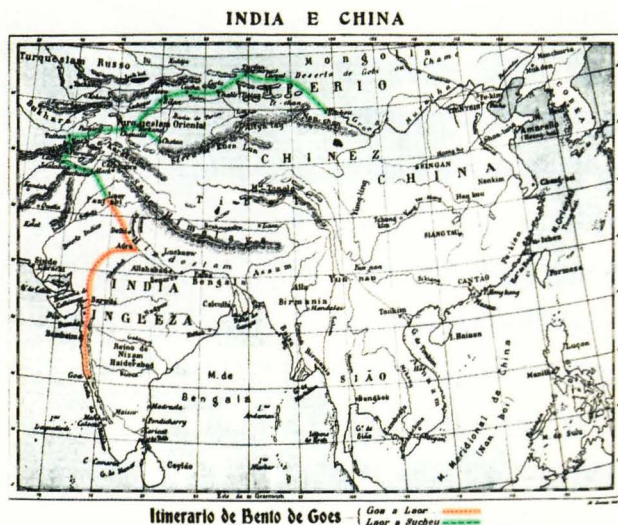
的職位，有一位研究科學的優秀教友，曾請求湯若望神父協助翻譯一部力學的書，由此兩人結為摯友，最後他竟幫助湯若望神父蓋了一座聖堂，並在教堂上豎起了十字架。西安府，陝西省的省會，中國的古都，是中亞來華商隊的終點站，湯若望神父又結交了一個回教商隊的領袖，依據從他那裡所得到的訊息，能精確地計算出到北京的全長路程，並得知沿途所定的規章。傳教士們很久以前就渴盼能夠取得這樣的資訊，因為由水路來中國，損失的生命太多了。湯若望神父的報告，並不是說陸路上的交通沒有危險；但他的調查證實了1607年時，鄂本篤修士（Bro. Benedicto de Goes）曾由陸路抵達了肅州，並證明了利氏所言：馬可·孛羅所謂的國泰（Cathay）就是中國，汗八里（Khanbaligh）則是北京。

這位鄂本篤修士，在偉大的探險家中



鄂本篤（Bento de Goes, 1562-1607）修士，偉大的探險家，歷經五年的翻山越嶺、忍受風雪肆虐、辛苦地橫越沙漠，發現由陸路前往中國並不比海路來得容易。

應占有一席，他們都企圖開闢一條在當時被認為不可能的途徑，但他們卻以罕見的勇氣和方法獲得了成功。他是亞速爾（Azores）人，雖受過相當的教育，卻像普通人一樣加入了軍隊，作為一個普通兵，被派遣到印度。他在印度進入了耶穌會，作輔理修士，當時年僅二十二歲。他伴隨聖方濟·薩威的姪子，傑洛尼莫·薩威神父（Fr. Jeronimo Xavier）到阿克巴（Akbar, 1542-1605）——



鄂本篤修士自印度臥亞，經陸路北上前往中國的路線圖。

蒙兀兒大帝的宮廷，在那裡學會了波斯文，並到喀什米爾 (Kashmir) 山谷探了幾次險。同時，由於他的友善和精明的忠告，也贏得了阿克巴的歡心。當他在阿格拉 (Agra) 時，由中國的耶穌會士所傳來的報告，曾掀起了許多爭論，不知道這中國是否就是十四世紀方濟會士所到達的那一個「國泰」。在

印度的耶穌會士，決定遣派一支探險隊，企圖聯繫他們在中國的弟兄們，揭穿神祕「國泰」的真相，並尋找一條通達那裡的路徑。結果選派了鄂本篤修士肩負起這項任務，於是他帶了蒙兀兒大帝寫給鄰國的推薦信，以及他的長上寫給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們的信函，毅然決然地出發了。他裝扮成亞美尼亞

人，與通商隊一齊出發。一路上所遭遇的困難和艱險，是派遣他的長上想像不到的，高山峻嶺、氣候嚴寒、黃沙遍野，在邊境的耽擱；又因為多種不同的因素：欺詐、強盜、疾病、仇視等，一直拖延了五年之久。在途中他曾遇到從中國來的人，由他們口中得知在中國已有許多外籍人士；關於這些人，他知道毫無疑問的是他同會的弟兄們。於是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他又繼續奮鬥下去，終於到達了中國的肅州。他送了一封信給利氏，竟耗費了數月之久，他在信中告訴利氏他將要死去。等到利氏遣一位教友送回信給他時，果然見到他已瀕臨生命的末刻了，據說，他是被同行的仇教者所毒害的。即使他曾受到仇教者的恫嚇：若不立時背叛基督宗教，便要教大象踩死他，他仍是公然聲明他的信仰，堅貞不移；但如今他真的快要與世長辭了，當時在那裡沒有人可以為他行終傳禮，他曾對那年輕的教友說：「我已經有五

年沒能恭領聖事了，但是我記得從阿格拉出發後，一直到今天，並不曾犯過任何一項大罪。」

幾天後他便去世了，留下了一枚苦像和一本經書，以及寫到最後一天的旅程日誌，一本有關地理上最重要的紀錄，及寫給同會弟兄們的公開信，說明他不主張由水路改為陸路前來中國的原因。

肆

IV. 修正曆法

當教務的發展進行順利時，禮部侍郎徐光啟，認為可乘機把修正曆法一事，委託給耶穌會士。他曾和一位瑞士籍的耶穌會士——鄧玉函神父磋商過，有關鄧玉函神父的事蹟，我們已在談述景教時提到過了，他在未入耶穌會以前，便以數學、語言和醫術聞名於歐洲，正式進入耶穌會時，年方三十五歲。他是迦利略的朋友，兩人同時被選為羅馬賽西會（Cesi Academy of Rome）的會員。他同意徐氏修正曆法的主張，於是便以公元1629年間的日蝕，做為公平的測驗，由三間負責天文的學院同時預測——即中國天文學院、回教天文學院和歐洲天文學院。結果前二者的預報發生了錯誤，只有後者，也就是鄧玉函神父的計算正確。禮部公布測驗的結果，皇帝詔示把計算錯誤的原因講述出來。朝中皇家學院的數學家，以及禮部全體官吏，均表示計算者並沒有犯錯，而是這兩個東方的計算方法有錯誤。因此唯一解決的辦

法，是以科學的方法改正中國的曆法。於是禮部呈奏皇帝，並蒙皇帝的批准，得以成立一個曆法局，專司此職，並命徐光啟為該局的主事者。徐氏另上一奏，特別稟明皇帝，坦承若沒有歐籍傳教士的協助，他便無法肩負起這項重任。1629年9月27日的敕令中，准許聘請耶穌會士從事這項工作；兩位博學的皈依者，也被提派到該局工作，並指定由龍華民和鄧玉函兩位神父協助。這兩位神父可以領取生活薪金，以及得到工作上的一切所需。

這項新的任命，自然被視為在中國的傳教史上的一個轉捩點，給予教士們在外方傳教史中，從未曾有過的威信，除了其間有幾年困擾外，耶穌會會士一直保有他們在欽天監的職位，直到該會在一個半世紀後被解散為止。果然如利氏所料，在京城傳教士，的確是因為博學而被認可了，這直接給全國



徐光啟在中國朝廷上力薦由耶穌會士修正曆法。

的傳教工作開闢了一條新途徑，也是利氏的傳教政策成功最充分的證明。

起初龍華民和鄧玉函兩位神父，在監中只是助理的地位，但實際上，整個的工作都靠他們兩人在領導，因此日後也把頭銜賜給了他們。鄧玉函神父就職後只七個月便死了。這實在是一項重大的損失，一切的準備工作都是由他一手承辦的，並且許多其他方

面的研究工作，也是由他負責，特別是關於中國的動植物、氣候和當地人民的習俗。他死後贏得了很大的名聲，喪禮十分隆重，許多朝中顯要都親臨弔唁。

接替他職位的是德籍的湯若望和義大利籍的羅雅各兩位神父。他們一位是三十九歲，另一位三十七歲。皇帝賜准了他們的任命，並詔諭各省的官員，給予他們在路上的

一切方便，使他們平安抵達北京。他們的首要工作，是為那些中國的助手們，翻譯專門的文獻，一年內，他們便能將七十二部經過徐氏優美的文筆潤飾後的天文學譯本，呈獻給皇帝了。但又過了兩年，徐光啟——這位與利氏十分要好的朋友又告死亡，當時他的職位是相國，他臨死前的最後一件事，是把耶穌會士在曆法局所做的事呈稟於皇帝，並奏請皇帝認可。他死後受到國家所能賜與的最大榮譽，同樣也受到教會方面的感激，因為他對教會的貢獻是無法估計的。只單單在一年中，經他親自感化的，就有一百二十人之多，其中大半是學者。至於直接或間接由他所感化的人數，更是無法計數了，但這些只不過是他貢獻的一部分。他更把自家上海徐家匯的產業，留給了會士們，兩個世紀之後，那裡成為耶穌會在中國最大的工作中心，一直到中共奪取政權為止。徐光啟的墓園就在那裡，並在1933年，即他死後三百週

年時，當局還特別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念儀式。

這位偉大的好人逝世後，在中國傳教史的第一階段，便算告終了。從第一位天主教傳教士——羅明堅神父和不久之後的利瑪



湯若望（Adam Schall, 1592-1666）神父深受皇室倚重，受命修正曆法。

寶神父，得到在中國居住的許可算起，剛好過了五十年。那時領洗入教的人數已超過四萬，隨後五年中，便增為七萬，十一年後，竟達十五萬。在全國各地，除了雲南和貴州兩省之外，每一省都有基督徒，但其間沒有一個時期，耶穌會的神父曾超過二十四人。

修正曆法的工作仍繼續進行，並漸趨成功，皇帝特別以最高的榮譽嘉勉在北京的耶穌會士，並親題：「欽褒天學」（Imperial Praise for Celestial Teaching）四字匾額頒贈，針對宗教或天文，似乎兩者皆可。其他的要員們也相繼來書致敬，對於這些榮譽，都在皇家公報上載明，也為教會帶來了新的評價，由此教會也獲得了更多的行動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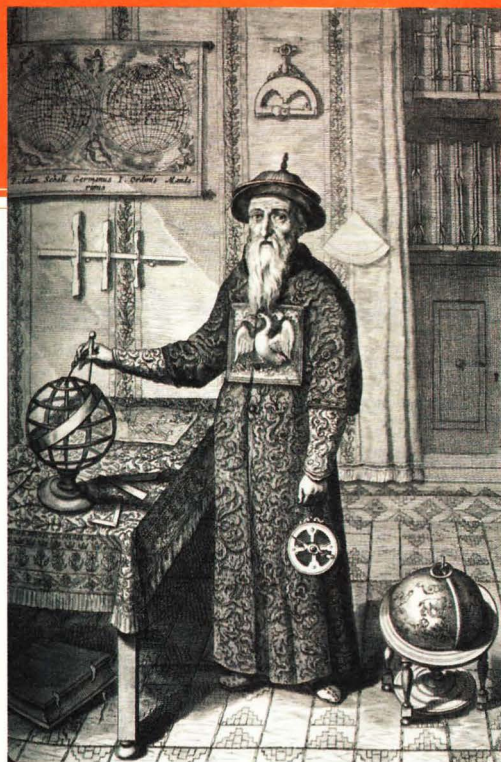
大約就在此時，基督信仰第一次獲准進入紫禁城，在宮中除了太監外沒有任何男性，只有為數眾多的女士，其中不是皇族

便是宮女。在這些人中，有不少太監和宮女們皈依進教，其中甚至包括了皇帝的女性親屬。他們有自己的聖堂，湯若望神父為他們舉行彌撒，但依宮廷的禮規，任何女士都不得參與，因此，對她們講道必須採取間接的方式。

此時，明朝的年限已瀕臨末期。湯若望神父的同僚羅雅各神父，在受任命後八年即逝世了，而此時湯若望神父已譽滿京畿，凡是對於與西方科學有關的事，全都求助於他，這幾乎成了一個很自然的現象。因此在北京準備抵抗滿清軍最後的攻擊時，毫無疑問的會請求他製造大炮。他雖然明言對於戰爭是個門外漢，製造鎗炮也非他的能力所及，但都屬徒然，他必須應承盡力試造。他小心翼翼，為了不讓人們誤以為他是崇拜火神，因此，在他工作的房間裡，清清楚楚地懸掛著一張基督像。在他的指導下，果然鑄

造出二十門大炮，並且非常成功，因此皇帝命他再趕造五百門。湯若望神父所建議的防禦計畫也得到採納，他認為他的所作所為，是在協助一個合法政權，抵抗侵略者的行為，因此他竭盡全力支持他們。但是同時，他也感到非常痛苦，因為他深知任何幫助，都無法挽救這已動搖的政體了。叛逆和內亂迫使京城在一年內淪陷、明朝政權瓦解，當侵略者進入北京時，皇帝和他的忠臣以自盡告罪國人。到此，漢族的最後一朝，在1644年上便告終了，明朝共統治中國二又四分之三個世紀。

經過了一段無可避免的混亂時期，端賴所採行的賢明政策，滿清政府逐漸獲得了支持。新的統治者不願中斷施政，因此湯若望神父得以安然盡忠職守，沒有受到干擾。幼小新皇的攝政王，十分景仰湯若望神父和他的工作，經常去拜訪他，最後終於任命他為



湯若望神父在京畿是西方科學的最高指導，明朝皇帝為了防禦岌岌可危的江山，甚至命令湯若望神父建造大炮。

欽天監大臣。這位耶穌會士遲疑不肯接受此一頭銜，他認為自己最好是擔任這項職務的助理，而另由其他中國官吏出任大臣。他雖曾七度上書懇請免去他的任命，最後在他的長上勸告下，才勉為其難地同意。全國其他各地的同會傳教士們，都知道由於耶穌會會士所得到的這一新的榮耀職位，聖教會的地

位也將隨之提高。

當年輕的皇帝在十七歲時廢除了攝政、親自掌握大權時，湯若望神父的地位，便成為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崇高，因為年輕的皇帝對這位老人非常敬愛，也十分信任。皇帝竟成了耶穌會院的常客，在會院中，皇帝會坐在湯若望神父的床邊，視他為「祖父」輩地與他閒談。神父也必須按時進朝，參與國事。當時湯若望神父在朝中，是一位極有影響力的人，一連升了數級，直到晉升為一品大臣。然而，他是一個極聰明且善於詞令的人，絲毫不肯濫用他的職權，更不容任何人指他僅是皇帝的寵臣；他非常忠誠，以致他與皇帝的接近，很容易被誤以為阿諛；但當他認為職權所在，卻沒能盡到鞭策這位青年的義務時，他會感到十分不安。

這位年輕的皇帝不僅喜歡湯若望神父，

對每一位到北京的耶穌會會士也都十分友好，尤其喜愛龍華民神父，因為他是教區中最年長的一位。在他去世前不久，皇帝還特別任命一個畫家，為他繪製肖像，他死時享年九十五歲。

在北京一切趨於平靜之時，這個新政體的建立，暗地裡仍隱伏著騷亂。當然新、舊政權裡都有著名的教友，當傳教士們想要遠



由南懷仁所設計的「耶穌會觀象台」佇立在繁忙的現代北京街頭，是北京的地標之一。

離政治時，他們的工作自然也會受到影響。七位耶穌會士——六位神父和一位修士，死於非命。同時山西、江西、福建的教堂被摧毀，還有其他很多地方也遭受株連，教友團體也被騷擾了。有些物質上的損失立即修復

了。譬如，在福建省，也是遭受損失最慘重的一省，那裡的總督佟國器，便自己出資，重建聖堂，由他經手所建的至少有一座新堂，其次還修復了許多座被搗毀的教堂。當時他的夫人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本人卻不是教友，直到二十年後，方才領洗入教。



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神父是一位數學兼天文學家，繼承了湯若望神父在中國的事業。

即使如此，基督信仰仍繼續著。比利時的一位數學兼科學家，南懷仁神父（Fr. Verbiest），被派來做湯若望神父的助手，日後繼承了他的事業；他們每年都在謹慎的計算著皈依者的人數，而這時已接近一萬，但根據到中國教區視察教務的德加瑪神父（Fr. De Gama）報告，在清朝第一任皇帝統治了十八年後駕崩之時，中國教區的教友人數，已達至十一萬四千人。

伍 暴風雨的日子

政治的騷擾並不是妨礙教務發展的唯一因素。記得我們曾提起過，在公元1633年，徐光啟逝世時，曾被認為是一個時代的終點，那也是一個新時期的開始，一個不幸而誤解的時期，對教務發展的影響，與政治的干擾同樣的嚴重；因為那一年有其他天主教傳教士抵達中國，他們的看法與耶穌會士不同，他們對耶穌會士的傳教法，全然不贊同。

正值教務拓展的那些年代，偉大的探險家，開闢了往來東西方的航海線，這時的中國卻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事實證明自從基督教從巴勒斯坦（Palestine）傳入羅馬帝國以來，就從沒有過類似的情形。中國的文明和文化，甚至比羅馬還要久遠，故此以對待未開化民族的傳教方式，來對待中國人民，是最不智的。這樣的經驗是經由時間換取的，早期配備武裝乘船前來東方的葡國商

人，一定得到了不少教訓，他們看清了，絕對不能像在其他各地的開路者一樣橫行霸道，像狂風般的直襲中國。此後，凡受過教



明朝末代皇帝崇禎（1627-1644），湯若望說他：「聰明卻不幸」，明朝在崇禎自縊後滅亡。



紫禁城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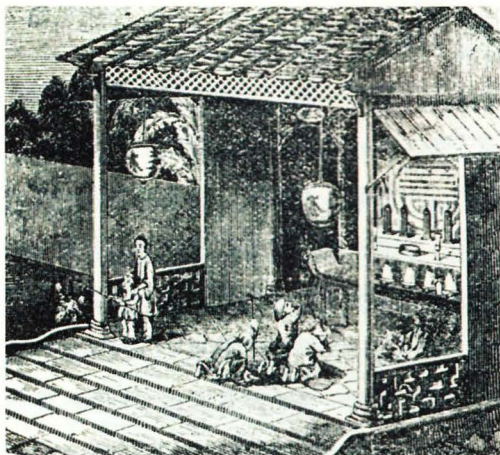
育的人，都認為教育和文化在這塊土地上，比任何地方都受到重視，因此想要把基督真理傳進去的自然方法，便是設法贏得當地具有領導地位者的重視。在其他各地，信仰通常是伴隨著旗幟而來。航海家通常有神父陪在身旁，當他們發現原始民族，踏上了他們的土地時，見他們以宗教之名，行迷信之實，並有令人噁心的行為，自然樂見基督宗教大舉傳入，希望下一代長大後，能自然而然地擁有基督徒的信仰。

在耶穌會會士由澳門抵達中國的初期，有些從菲律賓來的會士，想採用與在非島一

樣的傳教法，把信德的種子傳播到中國的福建省。所幸，由於耶穌會的「服從」誓願，當利氏傳教法被批准後，曾審慎地不讓其他方式干擾或阻礙此一方法的嘗試。

自然，此一傳教法只限於耶穌會士，並不能施用於其他傳教士身上。因此道明（Dominicans）和方濟會（Franciscans）的會士，見到運用其他傳教法在非島所收到的實效，使得基督教義傳播得那麼快，且深知在中南美洲的發展情形；更依據一些不實的謠傳，他們因此認為耶穌會的方法緩慢而不正確。他們相信介紹信仰的唯一而有效的方

法，是直接對人民講述，到市場群眾廣集的地方宣傳真理，告訴民眾他們原來敬拜的神是假的，而現今所宣講的，才是信仰唯一真神的宗教。他們以英雄般的精神勇往直前，冒著生命和酷刑的危險，也很自然地到處挑剔耶穌會士的瑕疵，並向國外呈報耶穌會士曲解真理，理應加以處分並撤銷。當然這是由於他們的熱誠，把仁愛和明智之心給蒙蔽



在祖先牌位前叩首、焚香。中國人的祭祖是否只是表達對祖先的崇敬和追思？

了。他們迫不及待的呈報到歐洲，抹殺耶穌會士的工作表現，並猛烈攻擊真心友善接待他們的耶穌會士，使人不忍卒聞。不用說，這當然使親者痛，仇者快，許多仇視基督教的人，見到教會內部的紊亂、自相殘殺，非常高興，他們更利用這機會興風作浪，煽起仇教風波，因此經過數十年稍稍有成的事業，遭受到嚴重損失，不少地方被摧毀殆盡。

兩位心懷這種錯誤熱火的人，僅帶了兩個青年做他們的通譯，成功抵達了北京。湯若望神父殷勤的接待他們，並把他們安置在耶穌會院中。他們盼望湯若望能引他們謁見皇帝，並能允許他們在京城裡闢一座會院。那時仍值明朝末期，湯若望神父盡力告訴他們，他們在北京已等了好幾十年，仍沒有一個耶穌會士朝謁過皇帝，至於居留權必須要多年的耐心奮鬥才可得到。但那兩位傳教

熱火強烈的客人，卻不肯相信湯若望神父的話，竟呈報說他們的傳教工作，受到耶穌會士的阻礙。更有甚者的是，他們鄭重的提出控訴，說是中國人的一舉一動，以及他們的風俗，都違反信仰。聖堂是由皇帝御賜的，堂內還懸掛著一塊有紀念性的匾額，字義卻是「皇帝萬歲」，明白人都知道這等同於在



歐洲人想像中的湯若望神父和中國皇帝；看在許多教會人士的眼中，這樣親密的關係教他們感到不舒服，甚至覺得嫉妒。

歐洲各教堂的聖所裡的一面國旗，但在呈給羅馬的報告上，卻說成在中國的聖堂裡面，有兩座祭台：一座是為祭獻天主，另一座卻是為了敬奉異教的皇帝。

這紙訴狀呈到了羅馬，立即受到羅馬的調查，在耶穌會士尚未能辯解時（因為他們直到最後才有發言權）便已蒙受了極嚴重的傷害。有些原告人，在中國停留了幾年之後，便承認他們以前攻擊耶穌會的事，完全是不確實的。因為那時他們方到中國還不滿一年，對一切事情都不甚了解，再加上言語方面的誤解，他們對此事甚感遺憾，慷慨認錯，但由於他們的誣告所招致的傷害，卻永遠也無法彌補了。就在此時，有人建議把教區劃分給不同修會的傳教士，中國疆土廣袤，不怕有哪一個修會分不到管轄區，這一建議被採納了，而且延用迄今。

那些挑剔耶穌會傳教法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在耶穌會會士中，也不是全都適應同樣的標準。有一個時期，曾有很多會士對湯若望神父不滿，指責他不該接受官職和官階，很多同會的弟兄曾嚴厲的責斥他。這不但使他受到羅馬總會長的調查，同時也受到教宗的調查，但在所有查證之下，都證明他是無辜的。不過，控告他的人，也都是為了本會著想，是出於善意的。

湯若望經歷了不少風波。一次，在他度過了多年的順境後，有一個和他敵對的大臣，同時也是學術界的庸才，掀起了人們對他的反感，使他被免除了官職、褫奪一切的榮耀，並因此而入獄。但這位無能大臣的奸詐行為，不久便被識破，而湯若望神父隨即恢復了職位和被剝奪的榮譽。但這一風波所給予這位勇毅戰士的打擊，實在太大了，因此在他恢復了官職和重獲榮譽後不久，便中

風去世。南懷仁神父繼承了他的職位，時值清朝第二位皇帝康熙帝當政。他深受皇帝的信任，曾經一度，每日都謁見皇帝，為皇帝講解數學、天文和其他的物理科學，他還特地為皇帝建製了天文儀器，這些儀器曾在北京的皇宮中保留了數世紀之久。他得到和湯若望神父同等的尊榮，並為他本人以及他的同伴司鐸，請准了在中國傳教的全面特許。這道皇帝的御令是在1692年——即南懷仁死後的第四年——正式公布，並由官方諭令各省周知。



以莫須有的罪名將湯若望入獄，他在獄中飽受折磨：上圖是光啟社所拍《湯若望》一片的劇照。

前此多時，傳教士們便屢屢建議教會當局，迅速在中國籌組聖統制。結果到了十七世紀，終於為各地祝聖了幾位主教，最初只有耶穌會士和外籍教士，直到1685年，一位道明會的神父羅文藻才被祝聖為首任的國籍主教，他也是第一位中國神父。他在中國境內，將第一批年輕的中國修士，祝聖為司鐸，他們都是耶穌會士（另外還有一位中國籍耶穌會士，是在澳門被祝聖鐸品的）。耶穌會的吳歷神父也是由羅主教祝聖的，他是中國清朝的一位偉大的畫家和詩人，也是把天主教術語介紹到中國詩壇的第一人。中國是一個地廣人眾的大國，不難了解在發展和進步的同時，難免也有持續不斷的紛爭和災難。對耶穌會傳教法一再發生的宗教仇視，在許多地方阻礙了教務的發展；而對整個「適應」問題的不同調，在舉世皆知的禮儀之爭上達到高峰，由之形成對耶穌會傳教士的最大攻擊。



首任中國籍主教、同時也是第一位中國神父道明會的羅文藻（1600-1691）。

祭祀亡者、敬拜祖先遺像和祭孔禮，是許多官方禮儀的一部分，其中潛入了許多迷信行為。這些行為是敬禮的主旨？或只是後加的細節，不必在意？耶穌會士主張後一說法，他們的觀點是根據學者官吏，如徐光啟和其他學識淵博、同時也是熱心的教友的見解和看法。沒想到日後竟成為仇視耶穌會的傳教士們的攻擊焦點。



吳歷，又名吳漁山（1632-1718），耶穌會士，也是中國清朝一名偉大畫家和詩人，他也是由羅主教祝聖晉鐸的國籍神父之一。

在呈給羅馬的正式備忘錄中，他們宣稱上述敬禮是拜偶像的行為，並請求教會當局加以制裁。傳信部接到呈文，認為十分正確而加以制裁。耶穌會立即派遣一位會士，前往羅馬為此一問題申辯。在這位耶穌會特使，衛匡國神父（Fr. Martini）——一位對此事極有資格發表意見的會士——的備忘錄中，他強調他們實行的方法已行之有年，傳信部也予以批准。結果，這一問題沒有得到真正的結論。假如道明會黎玉範神父（Fr. de Morales O.P.）所呈的第一個備忘錄是正確

的，上述敬禮便應該禁止；但若耶穌會衛匡國神父所陳述的是正確的，那麼該敬禮便是得到允准了。

耶穌會士相信他們的見地已獲採納，雖然當時他們並沒有解釋得十分完整，那是因為他們自身也無法得到一個結論，有些問題必須受到時間的考驗，或須將內部分歧的意見消弭才行。起初利瑪竇神父也把中國的習俗視為偶像崇拜，但當他見到叩頭禮，不但對活人行之，同時也對死人實行；對顯要

和對祖先一樣焚香示敬，他才認清了這只不過是禮貌上的致敬。在中國有很多習俗，很容易被外人或不明所以的人誤解。同樣在他們所用的術語中，如以「天主」代表真神，



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神父是禮儀之爭時，耶穌會派往羅馬的特使。

就曾在耶穌會與這一名詞的建議者之間，引發嚴重的爭執，最後終於獲得通過。在任何情形之下，一切歧見都未曾公開，但總會諮詢最可信賴的中國學者們。而這些學者們也總是盡其所能地發表他們的看法。因此對於這一問題，有了這樣的背景，而且他們所呈的報告中，已將事實載明。耶穌會士過於自信，認為他們的看法是不容駁斥的，再者也不願將中國急需要用的人才，長久留在羅馬。而對手所敘述的最強烈的觀點是：耶穌會所應允通用於中國的禮規，很可能被人們認為崇拜偶像，而極易對教會發生誤解；因此這種禮規當然應該廢除，況且這廢除令應及早宣布。然而耶穌會士並沒有因此受到處分，因為教會當局深知他們的行為是出於善意的，不過卻明確地對其不再信任。第一道廢除令於1704年發布，最後一道則是出於1742年。

當這請願書和反請願書呈到羅馬時，在中國的傳教士團體間的爭論，已成為人盡皆知的事。因此對耶穌會所允許的禮規，也有許多人群起反對。有不少熱心的教士，甚至公開指責那是「敬拜魔鬼」、「惹人討厭」和「可鄙的行為」。不消說，這種見解自會傳入中國學術界人士的耳中，他們認為這不啻是一種侮辱，更進一步的證明允許外籍人士到中國來，實在是大錯而特錯了。

南懷仁神父深知這敵視行為在日益加深，不過這使他更急於帶領一批對科學有

天主

「天主」二字代表天上之主，經過漫長且謹慎的思慮，耶穌會士才終於以此二字稱呼基督宗教的唯一真神。

成就的人到中國來，靠他們的工作來取得中國政府的諒解，並阻止排外和仇教運動的發生。至今，為中國教會真正出了力的耶穌會神父，大多數來自拉丁民族的國家，少部分來自德國及荷蘭。還有兩位瑞士人，即愛琴萊神父和亞倫神父（Frs. Adam Aigenler and Beat Amrhyn），兩位都是茵高斯大學（University of Ingolstadt）的教授，在他們兩人身上寄與了厚望；他們於1673年前來中國，但與其他許多會士一起喪身於途中。到目前為止，尚沒有一位會士來自法國，縱使他們在交趾支那（Cochin-China）——即安南——的工作成績，名聞遐邇，尤其是那位眾人皆知的大旅行家——陸德神父（Fr. Alexandre de Rhodes, 1591-1660），費南隆（Fenelon）認為陸德鼓舞了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創立）。於是，南懷仁神父由北京寫信給法國的耶穌會省會長們，告訴他們在中國的教區中，是如何需要傳教士，並請求他們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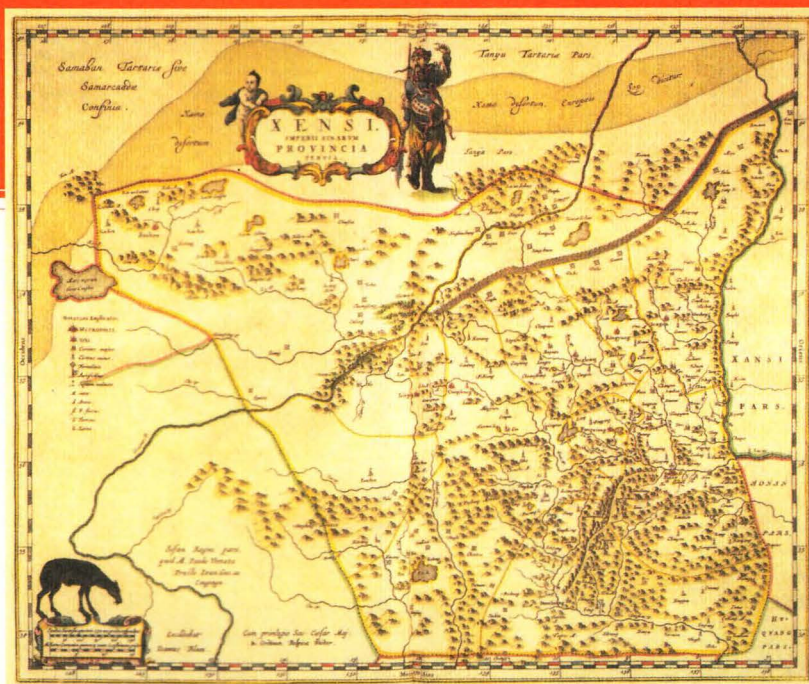
南懷仁神父的請求以及路易十四的支持，前後共有超過四十位的耶穌會士投入全中國的地圖繪製的工作。

立刻派人前來。

未幾，他便得到了答覆，法國耶穌會選派了五位在數學和地理方面極負盛名的人給他，這五位都是巴黎科學研究院（Academy of Sciences in Paris）的院士，當時法王路易十四世曾尊他們為「皇室數學家」，並供給他們一切科學器材。他們費了三年的時光才到中國，但當他們抵達寧波後不久，南懷仁

神父便去世了。當康熙帝發覺葡國人反對他們前來時，他宣布：「絕不可將有才能的人逐出本國，歡迎他們都到我們這裡來。數學家們要受到朕親自保護；其餘的人可自行選擇地區居留。」

他們成了開路先鋒，十五年內有四十位法籍耶穌會士來到了中國，他們主要的任務，是負責繪製一幅巨大的地圖，和其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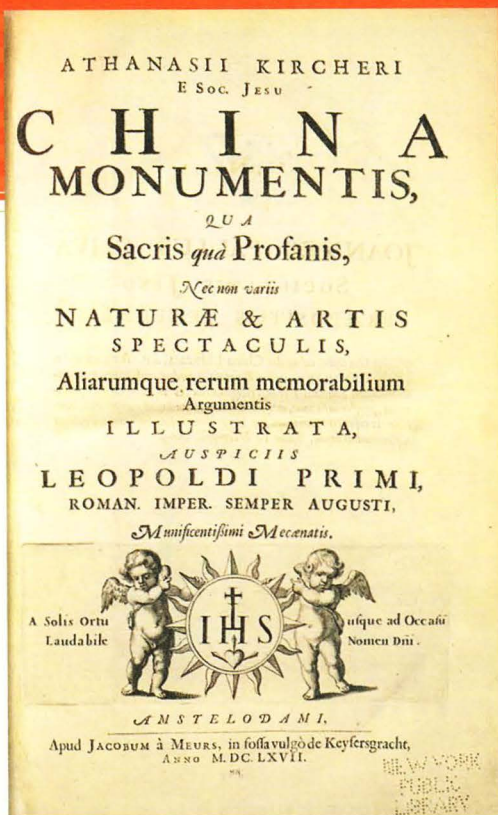
前一幅圖為北京及其周邊的詳圖，這一幅則為陝西省的地圖。

理方面的工作，同時也兼管欽天監的事務，徐日昇神父（Thomas Pereira）接替了南懷仁的欽天監職位。

利氏的原始中國地圖，成為日後許多位神父，如艾儒略、湯若望、南懷仁和卜彌格（Fr. Boym）的範本。卜彌格是一位波蘭人，他的父親是西琪斯蒙王（King Sigismund）的御醫。公元1655年，德籍耶穌會士衛匡國

神父，在中國重行出版這些地圖，繪製得十分精美，其中包括有十七張大型圖和一張極詳盡的註釋。這些地圖使用了許多年，一直被視為標準地圖，如今法籍的地理學家，卻使這項工作更往前邁進了一步。他們得到皇帝的邀請，將周遊全國，直到邊陲地區，以便能細心修改原有的地圖。

他們這一行程，整整花費了九年的時



P. 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所著的書圖文並茂，描述中國的風土民情、山川景色，這樣的書籍使得歐洲人對中國產生極大的興趣。

間，由洪若翰 (de Fontenay)、巴多明 (Fr. Parrenin) 和雷孝思 (Fr. Regis) 三位神父輪流指導，終於能將一幅「現代滿清中國全圖」呈獻給皇帝。那是一本極精緻的地圖，其中有一大張中國全圖，和十五張分省地圖，以及其他各種特別圖表。幾年後在巴黎

又印製了許多本更精緻的複本，多年來一直被視為中國的標準地圖。

皇帝對耶穌會神父從歐洲帶來的繪畫也十分感興趣，並請求派耶穌會士藝術家前來中國。在當時的情形之下，若聲稱或澄清繪畫並非耶穌會士的正規技能，是徒費口舌，故此申請狀傳遞到法國，當即便派來了兩位資質頗高的藝術家，一位是嚴拉底 (Gherardini)，另一位是鮑萊味 (Belleville)，他們於1699年抵達中國，並應皇帝的邀請，創立了一所中法繪畫學校。不過對於中國的畫家卻沒有多大的影響，他們最好的學生焦秉貞和冷枚，則在他們的畫作中表現出些許歐洲畫所特有的透視和比例。

此時，中國的藝術和文化卻在西方大為興盛，掀起了一般人的興趣，因為耶穌會士



利瑪竇和湯若望身著中國服飾，手持中國地圖。他們繪製地圖、修正曆法、藝術創作……用各種方式傳揚福音，在天上的聖依納爵和聖薩威為此喜悅萬分。

使中國和歐洲間的文化交流，尤其在中國與法國之間，已收到交流的實效。柏應理神父（Fr. Couplet），即是把南懷仁神父的請願書攜往法國、請求派數學兼科學家的那一位，因了他講述的孔子之道和孔子的智慧學說，而引起了法國人極大的興趣。這促使他們要求更多有關孔子的生活和教誨的資料，對於

這項職務，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倒是做到了，他們曾經印製了多種版本。幾年後，聶若望神父（Fr. Duhalde）在法國把會中弟兄們由中國寄來的書信和報告，匯集起來，編成一部四冊的著作，其中對中國的描述、地理、歷史、年代學、政治學和物理學刊載甚詳；這部書在當時非常有名，據說許多看過此書的人，對中國的認識，遠比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某些部分還要清楚。這種廣泛的影響，可由耶穌會克萊蒙（Clermont）學院的一個學生伏爾泰（Voltaire）身上窺見一二；他曾在那學院度過了七年，早期來到中國的法籍教士，在當時寄回他們滿紙熱情的信件，因此觸發了他對中國的興趣，他所著述的《風俗略論》（*Essai sur les moeurs*）脫稿後，多年後才付印，在書中他以很長的篇幅敘述了中國的制度。另外，他所著的悲劇小說《中國孤兒》，便是取材於一部馬若瑟神父（Fr. Premare）的中國戲劇。馬氏也是早期到北京

的一位耶穌會士，他所著的《中國語概論》（*Notitiae Linguae Sinicae*），直到今天還廣為漢學家所採用。

中國對當時審美觀的影響，可由出現於歐洲的「中國風」上看出；在某些耶穌會士的中文出版物的插圖中，也清晰可見。那時正是洛可可式時代，當建築師們精心工作，採用書中所畫中國廟宇或樓閣的線條時，許多法國的低級建築師裝置錯誤或草率抄襲。



俄羅斯公園中的怪異中國村莊，這就是所謂的「中國風」，也就是歐洲人用想像創造出來的中國。

結果令人不敢恭維，但也證明了這些書籍的普及。

當一切進行順利的時候，耶穌會士在北京忙於繪製地圖，並享有皇上寵信的至高尊榮，禮儀的爭辯也達至高峰，教宗的廢除令傳抵康熙皇帝御前，他非常震怒，並嚴斥膽敢批評中國習俗的任何外籍人士。他在1715年教宗克勉十一世所頒的教令上，用紅筆點圈，在最後還親筆御書：

「……此後不准任何教士到中國傳教，以免招致更多麻煩的事。」

此後，他一連頒布了幾道反對基督宗教的命令，正好給那些仇視傳教士們的官員一個機會，使傳教士們的工作無法繼續。

然而，在北京康熙帝卻沒有採取任何

行動，仍然與天文學家和製繪地圖的神父們繼續維繫著友誼和眷顧，因此在北京的傳教士沒有受到干擾。不久，康熙帝駕崩，恐懼隨之而起，因為他的繼位者雍正皇帝，一向仇恨外國人，並對任何科學都不感興趣；唯



康熙皇帝（1662-1723），大清王朝的第二位皇帝，與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十分親近，但也禁止新的傳教士到來。

獨仍寵信欽天監監正（因為那已成了一個傳統），並且當這一職位由德籍會士紀理安神父（Fr. Kilian Stumpf）傳給他的同伴戴進賢神父（Fr. Kogler）時，雍正皇帝特提升他為二品官，並委任他為禮部侍郎。雍正荒廢國政，悲殘的歲月好似要臨至地理學家的身上了，他們被康熙皇帝所任命的新任務，尚未完成。逐漸地，政務的主導權落入他的弟弟之手，在京城裡他對耶穌會士是非常友善的，尤其對宋君榮神父（Fr. Gaubil），最為敬佩，宋君榮神父是一位真正偉大、而且又最細心、最勤勞的法籍耶穌會的天文學家兼史學家，他是十八世紀前來中國的。當這位青年王爺掌權之後，他哥哥放逐一切傳教士（在朝中服務的例外）到廣州的命令，大多無人理睬。宋君榮神父被任命管理新的繪圖工作，並涉入國界問題。他一邊治理公事，一邊還繼續他自己的一項重要的工作：完成《成吉思汗史》。這位王爺希望早日看到新



雍正皇帝（1723-1736）繼位，他一向不喜歡外國人，也延續他父親反基督宗教的政策；但他仍然派了許多差事給在北京的耶穌會士。

地圖，因為他唯恐邊疆遭受攻擊，亦即指在長城外和西藏與喜馬拉雅山一帶爆發戰爭。他告訴耶穌會士按照他所說的作為製圖的依

據，而他所提供的資料，又是由別人那裡得來的，這無法保證他們工作的可信度，後來長年使用這地圖的人，很容易分辨出何者為真，何者存疑，他們發現有宋君榮神父保證的部分，完全值得信賴。

皇帝與其弟二人都不長壽，在康熙帝駕崩後十三年，滿清另一偉大的統治者乾隆皇繼位。他給國家帶來了莫大的光榮，並擴展了他的權勢，使世人皆知他是一位喜愛藝術的皇帝，也是開創皇家圖書室的人；但他同時也是閉關自守、不肯與外人往來的一位皇帝，因此在他的疆域內為教會帶來了災害。

公元1736年，新皇繼位的那一年，便發布了一道御令，禁止傳教和一切基督宗教的活動，違者處以死刑。當時這道命令已全然收到了實效，雖然並沒有遍及全國，或持續很久，但到處都有加害基督徒的事情發生。

不過對於在朝中服務的耶穌會士卻沒有改變，他甚至比歷史上任何一位中國皇帝，召請更多的耶穌會士到朝中任職。其中有許多人因他對宗教的迫害，已無心於工作，但由於必須服從會中長上的命令，故不得不勉力為他服務，也因此，使得北京的基督徒，還可以繼續從事教務活動，遠比其他各地更好。

在乾隆的統治下，不久便因降服高麗（Korea）、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和西藏（Tibet），而聲名大作；同時又宣布尼泊爾（Nepal）、安南（Annam）、和緬甸（Burma）為進貢國。他想要這些地方的所有地圖，於是派耶穌會士從事這項工作。兩位葡國神父負責此事，一個是傅作霖（Fr. Felix da Rocha），一個是高慎思（Fr. Joseph d'Espinha）。其中一位較為年輕，領受製圖大臣的頭銜。他們穿過中亞細亞，走了很長

的路程，從新疆到土耳其斯坦，並遠至目前蘇俄統治下的地區，這是在亞洲從未探險到的區域，他們把這些地區都繪進圖中，視為



耶穌會士郎世寧修士所畫的乾隆皇帝（1736-1796），乾隆皇以死刑禁止一切傳教活動，這使得像郎世寧一樣為皇帝服務的耶穌會士，處境變得既為難又不容易。

中國的版圖。當這幅地圖印就時，這兩位神父並未具名。不過，日後的研究者，仍能鑑定出來，給予他們應有的榮譽。

當把這些地圖以圖冊的形式呈獻到皇帝御前時，耶穌會的郎世寧修士（Bro. Giuseppe Castiglione）特別為它飾以中國的國畫；他是一位義國的天才藝術家，以傳教士的身分前來中國，自此成為一位非常成功的中國畫家。乾隆皇非常欣賞他，立即請他為自己一連串的勝利事蹟描繪成圖。當他發現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耶穌會士艾啟蒙神父（Fr. Sichelbarth）是一名極負盛名的大畫家時，他也召他來為自己工作。郎世寧這個名字聞名全國，是清朝最有名的一位畫家，在故宮博物院可見到他的作品；在一切權威性的中國畫集中，也都翻印了他的傑作。在他之後有一位法籍耶穌會士王致誠修士（Bro. Denis Attiret），他的令譽幾與郎修士並駕齊

驅。他在北京也享有皇帝同樣的特寵，並為天主教教友們邀獲了相當友善的對待，這在當時是極為需要的。

在公元1738年12月，皇帝的御令由北京傳遞到澳門，當時皇帝急需要更多的耶穌會士，尤其指明需要一位畫家、兩位天文學家、一位音樂家和一位製造鐘表及類似機械的人。似乎是上智對他們早已有了安排，當時他們這幾種人才俱全，因為在四個月之前，正巧有一艘船載來了十一位神父和修士，均為德、法籍會士，他們正期待著機會，繼續他們的旅程，到東方各教區去工作。他們當中具備著中國皇帝所需要的人才，劉松齡與鮑友管神父（Frs. von Hallerstein and Gogeisl）是數學兼天文學家；王致誠修士是一個畫家；魏繼晉神父（Fr. Florian Bahr）是一位優秀的音樂家；楊自新修士（Bro. Gilles Thebaud）精於修製各種機



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和他的畫作，他的作品在中國畫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為一個迫害教會的皇帝服務於心有愧，但郎世寧和其他耶穌會士仍繼續他們的服務，希望能為教會免除更惡劣的對待。

械，頗合京城朝廷中的需要。這些人本來都抱著引領人們歸向天主的傳教心火而來，結果卻被困於各類工作上近三十年之久。其中有人曾這樣寫道：「容忍，是壓在肩頭上的千斤擔，只為了一個目的：設法使皇帝對從事傳教工作的教士們有好感——期盼日後在痛苦和苦役結束之時，好進入天國。」他們

能夠帶幾位傳教士與他們同行，至少帶他們走上一段，到中國之後再將他們留在其他的地方工作。

此時，繪製地圖的工作人員，都有了新的工作。皇帝想要一幀長十二呎、寬六呎的巨幅世界地圖，作為裝飾宮廷之用。傅作霖

神父把它繪成了，皇帝看到它心裡忽然起了一個新念頭。他想要更多份中國地圖，把他所征服的地區也都繪出來，但不同於以前用手繪製，而是要如同從外國來的那種雕刻而成的地圖。即使再三稟明中國缺乏雕刻所需要的工具，且無人精通雕刻，但他仍期望耶穌會士能做到。幸好有一位過去在歐洲從事教育的教授，願意盡力一試。這位就是蔣友

仁神父（Fr. Michel Benoist），一個最有才華的人，註定要為皇帝盡不少義務；正如他的一個同伴所說：「為整個傳教區贏得皇帝的特寵」。他照著書本自行鑽研，學習如何雕刻，製造一些工具，並教給工人們使用。這期間他曾監製了一百零四塊不同的板，每一塊長二呎、寬一呎，皇帝見了非常滿意。由於皇帝的滿意，卻又給蔣友仁神父帶來了另一件麻煩的工作，那就是雕刻郎世寧修士所繪有關皇帝征服邊疆的十六幀圖，結果蔣友仁神父也順利完成了。



在南中國的珠海將昔日由郎世寧設計建造的北京圓明園原寸重現，右下方的兩個獸首是原圓明園的裝飾物，是最近在一次藝術品拍賣會上出現。

雖然有些在京城裡的耶穌會士聲名狼藉，而在傳教史上極負盛名，但他們只不過是派到此地工作的教士中的一小部分，其餘大部分的教士都正處於艱苦中。對於中國禮儀方面，羅馬曾發表過意見。因此，耶穌會士必須將他們以前所教



授的重要的禮規取消。禁止孔子的敬禮，任何官員學者已不可能領洗進教了，甚至已領過洗的人，也不能一面繼續做官，一面保持他們的信德。結果是沒有一個學術界的人士願領洗入教，偏偏學者又是這個國家中最受人敬重的階層。在中國文化與基督宗教之間，現在有一道障礙，而那曾是耶穌會士想以之為橋梁，用來感化整個民族。

當迫害教會的高潮遍及全國時，殉難的多半是其他傳教修會的會士，耶穌會自然也無法完全倖免，他們也是被仇視的目標，經常遭受嘲笑；以前的朋友和教友，有時就連其他的傳教士，也把責任推給他們，認為在中國所發生的一切惡果，都應由他們負責。最後臨到他們身上的最大打擊是，因著歐洲各國的仇恨，耶穌會被解散了。這張解散令，是1775年11月，在中國公布的；從這時起，直到1814年重行復會時止，耶穌會已不

復存在。耶穌會在中國傳承了一百九十年，而在中國工作的會士，總計有472人。

陸 VI. 新的開始

聖教會在中國，整個十八世紀都面臨著極端的困難。康熙帝的友情在南懷仁神父在世時，可說已達至了巔峰，但在禮儀之爭後，這友情卻轉為實際的仇恨。他的兒子頒令禁止一切公教活動，而他的孫子又變本加厲，頒下死刑，以懲戒企圖從事傳教活動的人。同時更激起了民間排外的心理，這也是由於許多外國政權的侵略態度所引起的。許多留在教區管理中國教友的教士們，他們的忠信雖是聞名於世，但想要在這種情形之下使教務獲得進展，簡直是不可能。教會幾乎連自身都難保了。在該世紀初，中國約有三十萬教友，到了世紀末，卻只剩下了二十萬，不過傳教工作從沒有中斷過。

十八世紀初葉，俄國境內曾發起了恢復中國耶穌會的運動。該會當初被撤銷時，完全是因為政治上的因素，根據聖教會的教會法規定廢止行動的必要條件，是必須公開

宣布廢止書後，廢止令方可正式生效。1772年，波蘭就曾經發生過這類的事，有一部分



乾隆皇帝的統治長達六十年，只比他的祖父康熙少一年。這段時間，因內外的原因，對教會而言都是非常痛苦的時期。

波蘭人隸屬於俄皇，其中有不少耶穌會士，他們有四間學院，兩處居所和十四個教區。那時俄國王權落於女皇凱瑟琳二世之手，她敕令學校仍需繼續開辦，廢止了彼得大帝對耶穌會士的放逐令，並宣稱自己是該會的監護人。

當廢止令於1773年傳至俄國時，她並沒有公開宣布它，耶穌會在俄境的長上，認為他有義務請女皇宣讀它，這樣他們才能完全服從於聖座的指示。女皇當即拒絕了他的請求，堅持不應在她國境內公開宣布那道命令，並表示她對耶穌會特別的維護和愛戴，並轉告給朝廷中的貴族，希望他們也都能依照她的旨意去做。教宗碧岳六世，自從被選為教宗起，便表明對耶穌會的關懷和偏愛，他認可在俄國的狀況，因此耶穌會便在這異常的情況之下，在以前最受敵視的國家中，保存了下來。在俄境選了一位代理總會長，

當女皇凱瑟琳派一位曾是耶穌會士的紅衣司鐸，以大使身分到羅馬時，教宗當即面諭他，對於在俄境內建立一座耶穌會初學院的請求，表示贊同。

這種境況繼續下去，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的最後幾年，而至下一個世紀。這一消息終於傳到了在中國的一位老教士賀清泰神父（Fr. Louis Poirot）耳裡，他是一位有音樂才



感謝俄國的凱撒琳二世（Catherine II），讓耶穌會在俄國存活下來，原耶穌會士試圖使它在中國復活。

能的人，也因此而獲准留在中國，仍舊做一名傳教士。他是由歐洲一位遣使會的神父那裡得來的消息，他立時寫了一封信，提出了兩項要求：一是請准他重新發願，並准他加入俄國的耶穌會。二是要求從俄境派一些會士，以便恢復耶穌會在中國地區的教務。他在做後面這項申請時，很清楚的看出，他並不知道教宗在1801年的諭令中，只准許耶穌會在俄境活動和存在；不過在他的信尚未抵達代理總會長那裡時，限於在俄境活動的禁令已被教宗撤消了。一位來自俄國的大使即將啟程前往中國，並安排義籍耶穌會士格拉西神父（Fr. John Antony Grassi）一同前往，與他同行的尚有一位俄籍神父和一位德籍修士。他們途經里斯本時，聽說俄使無法進入中國，此時教宗的使臣卻接到訓令：教宗批准三位耶穌會士的計畫，並希望他和他們一起前去。為此一問題，在葡國停留了很久，這三位會士忠誠的本著前人的傳統，奮力研

究數學和天文，希望能藉這兩項學問，再次為耶穌會士贏得寵信。到了最後，發現前往中國之路是絕對行不通了，不但三位會士沒有得到准許，即使是那位大使也未獲准。因此這三人就此分道揚鑣了。格拉西神父從沒來過中國，幾年之後，反而去了美國，至於賀清泰神父則不再有其他消息。

還未到十九世紀中葉，教會在中國的情形已逐漸改變了。根據1842年的南京條約，中國對外開放了通商口岸；並且自從1844年



1842年的南京條約以及之後的許多不平等條約，迫使中國向歐洲列強開放門戶以及基督宗教的傳教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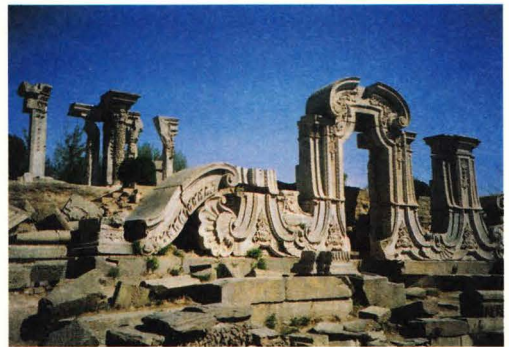
之後有一連串的國際條約，在條約中特別提出了對基督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款，最主要的是保證傳教自由和行動自由；在過去迫害教會時所沒收的財產，必須歸還給教會當局，或以賠款方式補償。

這對教會來說，卻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因為教會不願牽涉到政治條約上，尤其在許多欺壓和搶劫的情形之下，中國是處於被害者的地位，在壓迫下簽訂了這些不平等條約。因此，教士們謹慎小心，不願明目張膽地依仗權力的護衛，只是展現他們的一片赤誠，關心人們本身與精神的福祉，日久天長，人們便分辨出外國人與外國教士之間的不同了。而傳教士這一方面，也認為在友好的氣氛下，從事他們的傳教工作，遠比根據條約中信仰自由的條款好得多。

耶穌會被廢止後四十年，於公元18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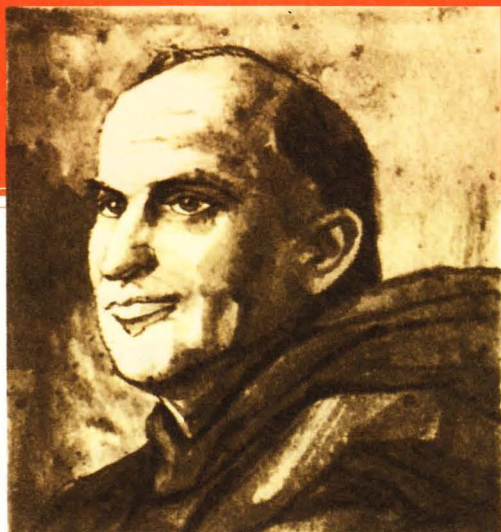
重行復會，自然一切事情都要重新開始。雖然在中國工作過的教士早已完全逝世了，但對中國的興趣，一直沒有中斷過，會士們永不會忘記很久以前，曾播撒過信德種子的地方。

耶穌會被廢止期間，原想委託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接手他們的工作，卻為外方傳教會婉拒，於是便由遣使會，即味增爵會取代他們。依當時的情形，遣使會是無法接管



對英法聯軍而言，不平等條約似乎是為了摧毀許多歷史性建築找一個合理化的藉口。以上為郎世寧修士所設計的建築物。

耶穌會北京的事業，因此他們只接管了其他的教區，甚至包括了南京教區，並擴展到整個江南一帶，即現在的江蘇、安徽與河南三省。在發生騷動的年代中，主教的繼承屢屢中斷，其中自1787至1840年這段冗長的時間內，江南僅有的幾位精神領袖，全是國籍的神父，他們為維護信仰的存在，曾表現出英勇的作為。當耶穌會復會時，就有幾位中國神父寫信給總會長，要求迅速派遣耶穌會的神父重返中國。同時在上海方面，也有許多屢經教難，而自始至終堅定維護了信德的教友，甚至在會士尚未獲准自由前來時，就採取了類似的行動。這座城市，於耶穌會在中國的最後幾年中，即成了他們最堅強的傳教堡壘，而他們的偉大事蹟，也永不會被當地的人們所遺忘。徐光啟的後裔更為教會犧牲了一切，他們的典範仍然留存。有些門楣顯赫的家庭，在為家族爭光的同時，信德也絲毫未損；其中嚴、陸、施三家，在他們宅



由於上海天主教徒的請求，耶穌會的總會長羅堂（Jan Roothan）於1841年任命法籍耶穌會士南格祿（Claude Gotteland）神父為江南傳教區（包括上海）的長上。

內都有自設的小教堂，可供教友們在不得公然參與彌撒領聖事時，到這裡來聚會誦經。1832年，這一聖善團體的領袖，寫信給羅堂總會長神父（Roothaan Johann）；1838年寫給葡國的皇后；又於1840年，上書教宗國瑞十六世，請求派遣耶穌會士返回中國。

在中國東部，教會的工作已漸趨安定平穩，因此遣使會神父重新努力，以期恢復教會的管理方式。當時南京教區的主教，正住在北京，指派了一位義籍的方濟會士羅類思

神父 (Fr. Louis de Besi)，他是好幾個地區的代理，同時又是江南的教區宗座代理；他以這種身分來到上海，當地的教友請他支持呈給羅馬的申請書，要求派遣耶穌會士返華。他立時上書給傳信部及耶穌會總會長，他的請求得到了准許。故此到了1842年6月12日，便有兩位法籍的耶穌會士，南格祿和艾方濟兩位神父 (Frs. Claude Gotteland and Francois Esteve)，來到了上海。

那確是值得紀念的一天，並不只是因為每一位耶穌會士對中國的懷念之情，而是因為上海也同樣備受懷念。利氏早年的同伴郭居靜神父，曾因徐光啟的邀請，於1608年到過那裡；當時徐氏方才領洗進教，而上海又是他的故鄉，兩年後，在他離開時當地已有兩百位教友了，那時杭州是省會，也是更重要的都市，應該是天主教的永久大本營。至於上海，要等二十七年後，才在該城建立了

一處永久的居所。潘國光神父 (Fr. Francesco Brancati) 被派往該地，成為該城的宗徒。他在該地居住了二十八年之久，親眼見到教友的數字直升至兩萬人。在上海開啟了中國第一座公開的聖堂，教中有不少是世世代代最忠實的信徒，無怪乎在耶穌會的年鑑中永遠紀念著它。

那兩位新來的耶穌會士，在剛到的第一天，便聽到許多有關上海教友對他們的懷念，他們一下船便直赴郊外的一個村子，那是由他們所管轄的，他們在那裡受到教友們熱烈的歡迎，場面極為動人，而那些教友又都為信德而飽嘗過辛勞與艱苦。他們聽說在1640年時，潘國光神父所蓋的中國風格的聖堂，仍然屹立在城中；當教友的人數日增，教堂規模也逐漸擴大，但後來在教會遭受迫害的日子裡，迫害者從教友們的手中搶去，改為供奉戰神的廟宇，卻因此而能保



當南格祿神父於1842年抵達上海時，驚喜地發現潘國光神父（Fr. Brancati）於1640所蓋的中國風格教堂，1724年被沒收，1861年再度歸還教友使用。

存迄今。他們還聽說潘國光神父的墳墓，仍立於城的南方，是徐光啟的孫女徐甘弟大所捐建的，徐氏在早期也負責建立了至少一百三十五座聖堂和小教堂。

在南京條約簽訂的兩個月之前，甚至簽訂之後，信仰自由的法令，仍需等待數年才發生效力，但長時期的迫害已成過去，教

會如今可以公開活動了。兩位新來的耶穌會士，他們首要的工作是遍歷江南（約為整個法國的一半），去發掘並重新恢復苟延殘喘的宗教生命。他們日復一日，馬不停蹄的步行或乘舟，到各處尋覓失散的羔羊，並為他們賦聖事。不久又有一位耶穌會士李秀芳神父（Fr. Brueyere），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但沒有多久又從這傳教的旅程中被召往他處，主教特委他負責成立一所修道院，為培育中國的神職人員。公元1843年，修院正式開啟，當時就有二十三位修生入院進修。

兩位開路先鋒的神父繼續他們的行程，他們獲得令人滿意的成績，使他們忘記了辛勞。後來，艾方濟神父已能從幾座村子中召集新發現的教友。在他們到達中國六年後的某一天，他聽過告解，給孩子們付過聖洗和堅振（這是傳教士的特權）後，便不支倒地而死，享年只有四十一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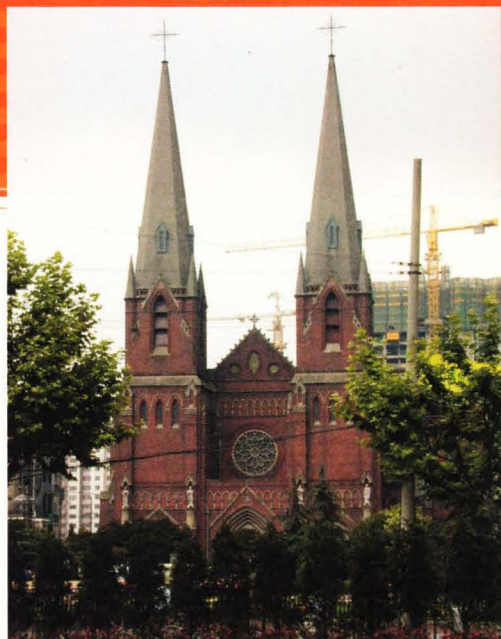
幸而有更多會士來增強他們的行列。就在1846年夏天，到了十二位，過了兩年後，神父的總數已達至二十四位，此外還有一位讀書修士和四位輔理修士。在1846年到達的神父之中，有一位梅德爾（Fr. Mathurin Lemaître）神父當時不過三十歲，卻為各項公教活動奠下了基礎，使上海成為新耶穌會士在中國的主要中心。



上海法國耶穌會傳教區的第三任會長梅德爾（Mathurin Lemaître, 1816-1863）神父最重要的一項成就，是取回耶穌會被解散前在上海的產業。

1846年3月18日，中國的皇帝詔令全國各省，把教士們以前的產業全部歸還，那些已改為廟宇或公共建築者除外，但對於這些也應採取適當的賠償。當羅主教決定申請歸還教會在上海的財產時，他指定由梅德爾神父前往談判。在城中有三處是屬於昔日傳教士們的財產，即聖堂、寓所和公墓；初步交涉的結果，歸還了天主教公墓，即「聖母堂」，潘國光神父便葬在那裡。其餘二處，如今已改建成一座廟和一座學院，故此又撥另外兩塊土地做為補償。一處是在舊日的中國城裡，在緊接的幾年中，便建築了聖方濟·薩威堂——後來成為當時上海的主教座堂，於1853年落成，負責人是一位耶穌會的輔理修士馬撒（Louis Massa）。其餘一處是古城外不遠的地方，那裡日後變成了法國租界。

接下來的工作，便是尋覓一處作為耶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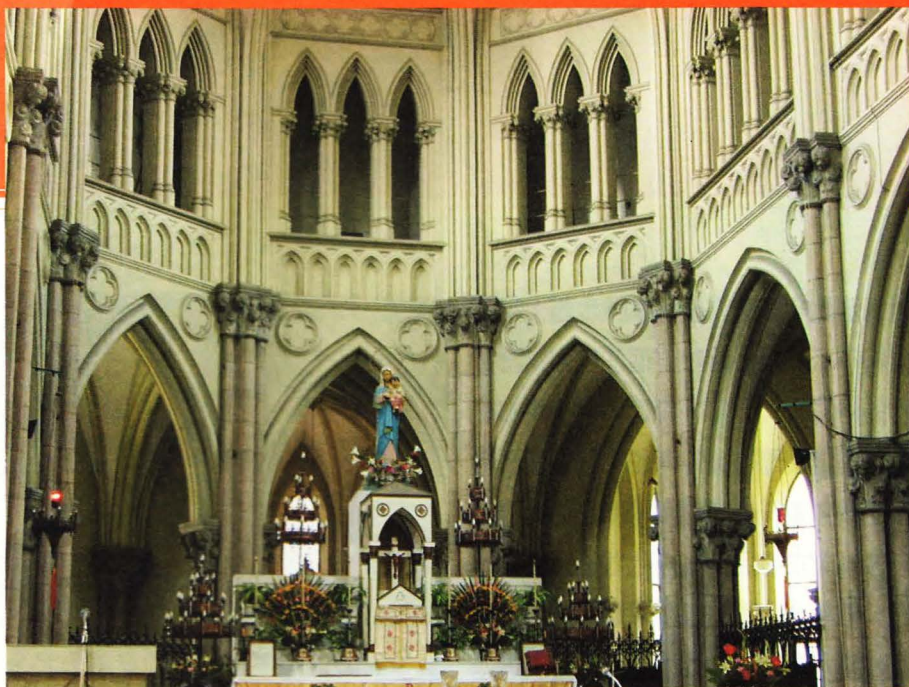
梅德爾神父取得城外不遠的土地，為了建造會院和聖依納爵堂；不久之後，一座極雄偉的羅馬式教堂矗立於此；1904年，它被改建為目前的哥德式建築，且如今為最熱鬧的上海市區所環繞。

會院的地方，因此，梅德爾神父在徐家匯村外買了一塊土地，離城只不過數哩之遙。那兩位重新來到中國的耶穌會士，就是在本村接受教友們的歡迎的。徐家匯是昔日徐光啟的家園，他死後八年，於1641年埋葬於此。靠近他的墳墓附近，住著他不少的後裔，他們熱心虔誠的信仰，正如他們的祖先一樣。緊接著便是一座聖堂，那裡是一所最大和最堅強的教友組織中心。十九世紀的耶穌會

士，找不到更適合作為會院的地方，因此他們請求將墳墓周圍的土地讓與他們，蓋一座規模較小的會院。這是才復會的耶穌會，在中國一切事業的開端。

到了公元1850年，在耶穌會轄區的教友數字，已達至七萬人。其中除了新近受洗的孩童之外，大抵均為「老教友」，充滿復興後的新活力。不幸的是那時適值荒年，隨後又是極可怕的流行病猖獗。四年前抵達中國的十二位會士中，有兩位因染患斑疹傷寒而不治病逝；一位是由於整日冒著風雨，到處為飢民分散食物，勞瘁而死；還有一位是在將死的教友身旁，因感染疾病而猝死的；他們兩位都是義大利人，那時其他各國的耶穌會士，都一齊來幫助法國神父們，法籍耶穌會士受託照管這一區域。

現在他們首要的工作之一，是在徐家



聖依納爵堂華美的聖堂內部。

匯耶穌會院附近，建立一所孤兒院。荒年和流行病，留下了一群無父無母、流離失所的可憐兒童，急需有人來照管他們。兩個世紀前，公元1634年，旱災、荒年和傳染病猖獗於山西、陝西和河南三省時，高一志神父在絳州（今山西省）設立了第一座中國孤兒院；這座眾多孤兒院的前驅，後來託給教友照顧，並受到該省總督和其他官方人士的支持。現在耶穌會又在上海附近，創立了這座規模較小的新孤兒院。在它方才創立不久，

太平天國之亂起，太平軍進擾南京及上海近郊，不少教友逃到孤兒院避難；這座孤兒院，也權充侵略和抵抗者雙方的救護站。在這一役中，上海的戰事並未蔓延太廣，主要的原因是教會也幫助了太平天國那方面的傷患者，致使他們很快便撤離了上海，對教會財產並沒有加以任何破壞。

表面上好似乎平安無事了，因此下一步該是重新劃定傳教區。南京的主教區轄下的江

南監牧區廢除，而成立了南京代牧區，管轄範圍雖縮小了，但仍轄有整個江蘇省。於是耶穌會的權力被瓜分了。南京代牧區委由巴黎省監管，年文思神父（Fr. Borgniet）任第一任宗座代牧；同時在直隸（即今河北省）東南方，也成立了另一宗座代牧區，亦委由耶穌會法國另一省即香檳省（Champagne）來代管，其大本營設於亞眠（Amiens）。郎



郎規拉（另名懷仁，Msgr. Adrien-Hipp Languillat, 1808-1878）神父1844年抵達上海，1859年任直隸東南教區（今之河北省）第一任宗座代牧主教，1864年調任江南宗座代牧區代牧。

規拉主教（Msgr. Languillat）任第一位宗座代牧。

未幾，戰爭又回到上海附近，這次徐家匯卻無法倖免了。孤兒院遭到洗劫，一位企圖保護孤兒院的耶穌會士——馬撒神父（Fr. Rene Massa）被劫匪殺死，二十六個孤兒也與他同時慘遭不幸。他的兄弟也是一位傳教士，即馬撒修士，在馬撒神父殉難前便被侵略者逮捕了，並被判死刑，但他僥倖脫逃了。上海城由於法國軍隊的介入，終能倖免於難；為了紀念此一事件，歸還了潘國光神父的老耶穌會聖堂，並恢復了昔日的用途，奉獻給無染原罪聖母。在土山灣，大規模興建孤兒院，由耶穌會修士照管，隨著時日的變遷與前進，後來又被改為工藝學校，走在時代的前端。

上海城雖倖免了，但全省各地仍遭受到



在徐家匯的會院的土地上，開始了許多當時社會上急需的工作：1864年在會院的後方蓋起了一座孤兒院。

蹂躪。大部分的聖堂被拆毀，將近一萬名教友死於戰爭或疾病，又有一位耶穌會士，費都爾神父（Fr. Victor Vuillaume）遭暴力而死。教士們的死亡率非常高，在他們返華後的最初二十年中，平均壽命不超過四十歲。

但是，教會在這種情形下仍在繼續成長，教友的數字穩定的上升，在上海必須有另一座聖堂。到了1855年，蓋起了一座大聖若瑟堂，位於舊城外，是一塊政府用為補償以前教會財產的土地。時光不停地飛馳，在

那塊土地上的本堂區，曾四度劃分，並蓋了數座新聖堂。

對中國籍司鐸的培育，已是刻不容緩的事，故此積極籌備發展修道院。到了1847年，修生人數已有三十七名，署理主教准許把修院遷到浦東的張家樓，因那裡有更大的公教團體。由於人數繼續增多，而不得不將其分為大修院和小修院。大修院在1853年遷到黃浦西岸，靠近主教座堂。最初的三名中國學生，於1858年晉升鐸品。

小修道院遷移到徐家匯的徐匯公學旁，這座公學三年前已開辦，以便為有希望的學生提供中等教育。主要的學科是中國古典文學，其目的是為了考秀才——等同於西方的學士地位。這座學校當時曾名震一時，申請入學的人非常踴躍；但該校每年所收的學生，最多不得超過一百二十五人。學生是由

各地甄選而來，絕不僅限於上海一地。

獲得徐家匯土地之初，就已興建了一座小堂，這小堂在初期，尚足敷所需，但等到學院開創後，它便嫌太小了，故此又重建了一座大堂，奉聖依納爵為主保。但過了將近半世紀後，這座堂又嫌不敷使用了，只得將它加以擴建，擴建後成為中國的第一大堂，仍稱作聖依納爵堂。那時已由國籍的耶穌會士管理，因為在1862年，耶穌會在上海已創立了一所初學院。

不幸那年發生了可怕的霍亂流行病，蔓延了整整兩年之久。宗座代牧年主教，與其他二十二位耶穌會士，以及將近四百名的在俗教友，都在這次瘟疫中斷送了性命。以前由江南派到直隸東南部任宗座代牧的郎規拉主教，如今又被調回上海，負責該代牧區。他接任後，積極重建因戰禍和天災而造成



秉持耶穌會的傳統，於1850年創辦徐匯公學（左圖）；三年後，一部分劃歸小修院。1880年，於原址重建為一新建築（右圖）。



主教和會長們對於聖召都極為重視，在這一區域成立了好幾處大小修院；終於在1909年於上海建造一所大型神學院，曾聚集了來自中國各地的耶穌會修士；1934年起，外國傳教士在此修習神學。

嚴重損失的教區。在前八年，共有二十四位傳教士死亡，次年未，又有六位死於斑疹傷寒。

主教最初的工作，在於發展全省的傳教事業，他覺得災後的人們，急需要物質上的幫助，和精神方面的管理。那時有一位極為卓越的人——金式玉神父（Fr. Joseph

Seckinger），剛剛開始從事傳教工作，為後起者立下了極好的表率。他設立數十處傳教站，開辦診所，創立孤兒院，對任何困難和不幸的打擊，從不灰心氣餒，雖然那時磨難從未間斷。他的影響與善表，對鄉間的直接傳教工作，給予極大的鼓勵，教友的數字也穩定的上升。郎主教並從歐洲帶來了修女，以訓練當地的修女，組織一個與大眾有更多



金式玉（Joseph Seckinger, 1829-1890）神父，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傳教士；不只是在牧靈方面，也在今日我們所稱的社會與科學的傳教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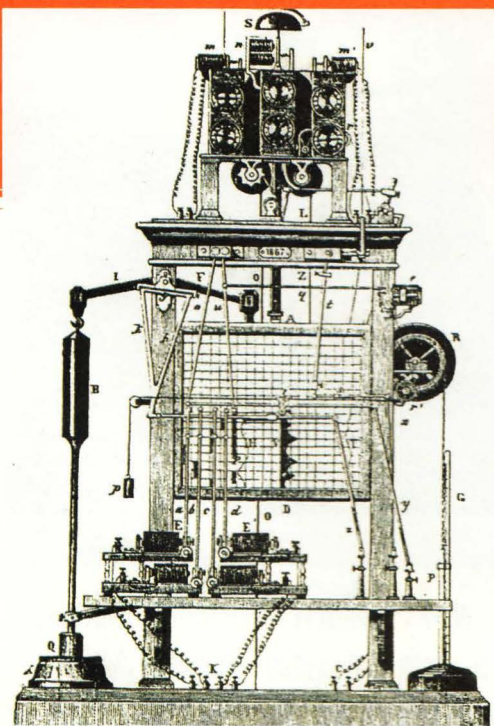
接觸機會的中國女修會。而徐家匯第一座修女會院——加爾默羅會——也是由郎主教奠定了基礎。

1870年，郎主教前往羅馬參加梵蒂岡大公會議，回來後又有一項新的決定，直接影響該城傳教士的生活。從耶穌會傳教士返華後的工作情形來看，是無法再與學術界有多大接觸了，因為做官是一條朝向卓越與影響



宗座代牧郎主教返回上海，希望耶穌會士回到利瑪竇神父所採用的傳教法——也就是透過科學進入中國社會；因此，於1873年興建徐家匯氣象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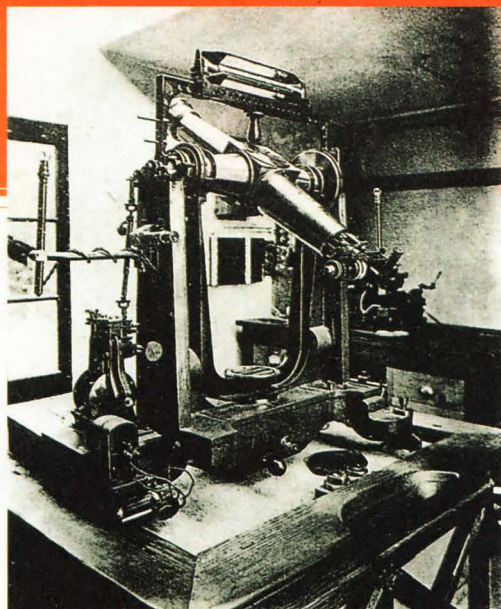
的路，那階級的人士只有極少數歸奉聖教；因為教友不准參加被教會視為迷信的公開的禮俗，故此很多有權勢者不願接受教會的感化。利瑪竇神父從未企圖利用「從上至下」的傳教法，亦即勸化領導者進教，然後讓民眾仿效他們，如宗教改革的首領在英國領導誓反教時的作風；但要使各階層人士認識基督宗教的真理，有必要博取具領導地位人士的信心，以便獲得傳述訓道的自由，進而能使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因著學者的皈依，而有助於他們進教。但他與他的同伴已被判對中國禮俗的解釋錯誤，現在不得不改變策略，去皈依那些不屬於或不想屬於統治階級的人。而今，外國的生活方式逐漸地進入中國，於是導入了新中產階級的建立。與西方的接觸，激起了貿易的新發展，一個新的商業社會開始長大，中西人士間的相互交往，開啟了中國人對西洋科學的重視。郎主教決定抓住這個變動的機會，採取新的方式，獲



徐家匯氣象台愈來愈著重於氣象方面，它是全世界氣象聯合網中最重要的遠東氣象站。不久後，它還擁有了多用途的氣象儀器，此一設備是由一位耶穌會士所發明，還曾在巴黎獲得這一領域的國際創作獎。

得這個新階級的興趣。

他的第一步，極近似利瑪竇神父到中國時所採用的方法，他在徐家匯創建氣象台。起初就是由於數學和天文學的力量，使得耶穌會士受邀修正曆法，透過這些方式贏得了皇帝的寵信和譽滿全國的聲譽，也的確為傳



向內地擴展的佘山觀象台，其貢獻較集中於天文方面。

教士們鋪了路。難道在這十九世紀，科學就不能幫助發展基督宗教了嗎？

在歐洲負責派遣會士到中國來的耶穌會長上們，牢記數世紀前「中國傳教區始祖」范禮安神父所留下的寶貴意見，他主張派遣有學識的人，因為他們要去的那個國家，非常重視學術，故此次他們派遣有專門學識的人，以應所需。其中最著名的有高龍鞏神父 (Fr. Augustine Colombel) 和劉德耀神父 (Henri Le Lec)，他們兩人都精通數學與天



文。高龍鞏神父是氣象台的第一任督導，之後由劉德耀神父繼任，在他們的管理之下，特別著重於氣象和天氣預報；很快地，人們肯定這件工作的價值。大約過了十年左右，他們已能對颱風加以觀察，並能預報暴風侵襲的時間，這真是以前從未夢想到的。在十九世紀八〇年代，勞積勳神父（Fr. Louis Froc）榮獲「颱風神父」的雅號。他一連建立了好幾處觀察站，以便掌握第一手颱風動態，因而使這座氣象台深受航海界重視，而聞名於世，這已成為氣象台中最有名的



今日的佘山觀象台，它是由高龍鞏（Augustine Colombel, 1833-1905）神父所創立的徐家匯氣象台擴展而來的。

一部分；此外還有其他的部門，包括有地震學；在遠東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裡一直是測量地震的最高權威，後來被天文聯合會（Astronomical Union）選為地球經度三個基本基地中的一個；從1877年起，它在地球磁學方面蒐集了很多有價值的資料。後來又擴展到佘山，即徐家匯外十五哩處，它的天文部門，與世界各聞名的氣象台共同合作，在太陽輻射方面的研究與貢獻，也是舉世皆知的。蔡尚質和雷鴈神父（Frs. Chevalier and Lejay），也由探測中製繪了初步地圖，成為日後測量學的基礎，也是所有中國的動力地圖的根源。



為追隨利氏之路以及受到郎主教的鼓勵，韓德神父創立自然博物館，館中收藏之中國地區的動植物標本尤其豐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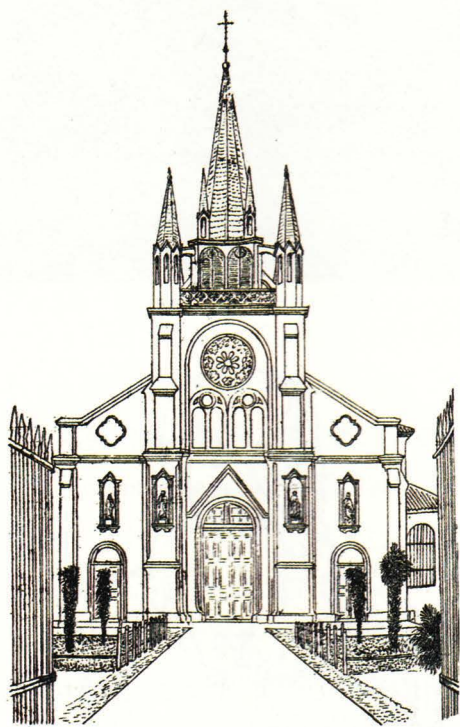
韓德（Pierre Heude, 1836-1902）神父，是非常卓越的博物學家，他一生中旅行過240,000公里的路程，收集中國及其鄰近國家的動植物標本。

在1871年，這座氣象台方才建成之時，並不能預見這一切，但對於開路先鋒，郎主教都會給予機會和鼓勵。他同樣地鼓勵了韓德神父（Fr. Pierre Heude），他是1868年來到中國的一位動植物學家，曾與他的傳教工作共同經歷了三十年的探險生涯，所蒐集的標本，是在中國的動植物界之中最優秀的，他死後多年，在上海便建立了一座以他為名的「韓德自然博物館」。在這座博物館中也陳列了很多中國古物，都是教士們到中國之後所蒐集的，原本由徐家匯的一位耶穌會修士保管，直到有了這個適宜的地方，才再將

它們仔細整理並編排目錄，提供學者作為參考。博物館還出版了一系列「中國皇朝歷史回憶錄」。

另一個接近知識界的重要途徑，就是拓展教育，迄今為止，耶穌會士所創辦的只有一所徐匯中學。到1872年，主教開辦了另一所聖方濟學院，開始時規模很小，十年後遷移到一個可以永續發展的地方。經過了二十五年的苦心經營，然後交給了聖母昆仲會。幾年後，由於法國租界的關係，傳教士開辦了另一所中學——中法市立學校，過了大約二十年後，這所學校也移交給聖母昆仲會。

當上海被視為貿易中心，而其繁榮程度又遠超越澳門時，葡籍人士一同遷往上海，也因此又建立了一座新聖堂——聖若瑟堂，於1876年正式落成，過了幾年之後，聖文生



當上海成為一個國際性都市，耶穌會為新來的移民開放聖若瑟堂，尤其是來自澳門的移民。

會便在中國的香港成立。

在這一整段的時間裡，漢學研讀自然

吸引傳教士的注意。起初是為了切合實際，因為中文的認識對於傳教工作十分重要。這學習的開端是在徐家匯，也是在這裡出現了「漢學家」的新紀元。第一個獲得「漢學家」名銜的人是晁德蒞神父（Fr. Ange Zottoli），他在徐匯公學成立時便指導該校校務，而在他前三十年的傳教生涯中，也曾從事於研究工作。他是公認的中國語文學者，為了幫助那些想要學習中國語言的人，他特地著書輔助他們，在他死後聲名仍流傳許久。學習中文的參考書，日後又出版了很多，其中包括迪貝斯神父（Fr. A. Debesse）和貝迪榮神父（Fr. Petillon）所著的字典和學習中文指南等。

其他漢學家又發展至另一個中國學術範疇。如夏鳴雷神父（Fr. Henri Havret）創建了「漢學雜集」（*Varietes Sinologiques*），把多年研究的結果都記述下來。地圖、地圖

冊、地理學專集、古物說明，以及「漢學教科書」也按期出版了許多年，其內容涉及到各門學問，如中國的考試制度、運河、中國境內的猶太人等。在夏鳴雷神父主編下，嚴禁記述有任何不實或不謹慎的地方。

當然，為做他們的研究，外籍傳教士需要良師的指導，他們一直希望能由會中產生幾位學問優秀的中國會士，這樣他們的工作進度會遠較外籍會士迅速。第一個便是黃伯祿神父，早在他進會之時，便被視為是一個聰明異常的學生，而因為他在神學方面的表現，曾榮獲教宗碧岳九世的金製獎牌。他曾著中文書十二部、拉丁文兩冊、法文七冊。其中最有價值的，是有關中國技術方面的主題、中國法律的合法統治權、日蝕和月蝕、中國所記錄的地震、中國與歐洲的新月曆法、中國的婚姻法等。他所著的書籍和發表的專題非常之多。



馬相伯（1840-1939），曾是耶穌會士，是知名的學者和教育家；協助耶穌會創設震旦學院，後升格為震旦大學。

「漢學雜集」的出版，是導致在徐家匯建立一間漢學機構的原因，日後成為中國天主教所有教區的諮詢中心。《中國天主教傳教年刊》（*Annuaire des Missions Catholiques en Chine*），是年刊性質，供給不少策略性的報告；權威學者，如德禮賢和裴化行（Frs. Pascal d'Elia and Henri Bernard）兩位神父，也在上面發表有關傳教的研究文章。

到了二十世紀初，公元1903年，耶穌會創立了震旦學院，得到一位在學術界很有名

望的教友幫忙，該人在政治生涯中也極富盛名，他就是曾經做過耶穌會士的馬相伯。這座大學，有一段時期曾借用徐家匯氣象台的老房子，因氣象台已遷移到佘山（在它近旁是一處聖母聖地，已被視為全國性聖地，是眾人前往朝聖的地方）。但它發展得那麼迅速，五年後已遷到較寬敞的現址，終於在那塊十七畝多的土地上，蓋起了十幾座雄偉的建築，有法學院、醫學院和理學院，後者包括物理與工程。



震旦大學初時曾借用徐家匯氣象台的老房子，但很快更發展成在市內占地七公頃的大學。

在這些年中，天主教徒的人數，不拘在城市或整個教區之內，都在直線上升，已接近十五萬人之譜。耶穌會士也達到一百四十人，其中二十五人是國籍會士。一間完整的耶穌會讀書學院，在徐家匯落成了，成為當時許多公教活動的中心，是其他教區所無法相比的。在上海及其近郊又成立了無數的堂區，以及天主教其他關於社會和慈善方面的各種事業，如醫院、養老院、大學、小學和分別為男女設立的工業學校，也都獲得長足的進展。充滿活力的天主教生活，使上海成為中國獨一無二的都市。

這些年中城外廣大的傳教區，卻還沒有享受過安寧。十九世紀七〇年代，當上海的教務突飛猛進時，江蘇省其他各地，正面臨一個教難和壓迫的新紀元。一位中國神父和兩位年輕的教徒被殺害，他們的屍體被扔到正在燃燒的聖堂中焚燒。有許多聖堂和教區



佘山俯視著上海平原，傳教士在那兒建了一個小教堂紀念聖母。

建築被搗毀，很多教友被逮捕，其中有不少人音訊全無。在隨後的十年，江蘇省北部開闢了一個新的教區，但十四年間它沒能品嚐到和平的氣息。聖堂、會院和孤兒院都被摧毀，新入教者的堅忍精神，達到了英勇的程度。

擁有上海和首都南京兩大都市的江蘇省，只由一個代牧區管轄，似力有未迨。到了1933年，南京和上海劃分成兩個代牧區，

把上海及其近郊分給耶穌會，南京則由中國教區神職人員管轄。

有著足夠的空間，發展上海教區的教務，在復會之後，上海已成為耶穌會在中國的搖籃。在發展的那些年中，許多耶穌會的其他團體，也獲得了在中國進行傳教工作的權利。



佘山上的小教堂於1871年重建為瑰麗的大教堂，其頂端樹立著聖母為世界獻子的雕像。今已成為全國性的朝聖地。

在十九世紀後半葉，耶穌會對培育本地司鐸和傳教士付出極大的心力，將在二十世紀看見它的成果。圖為1934年中外籍耶穌會士在上海近郊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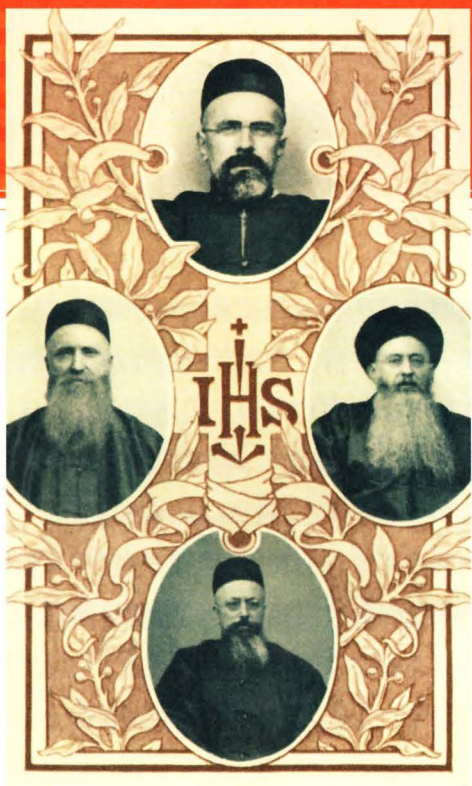
染 VII. 二十世紀前半葉

1856年，首先將原有的教區劃分，一部分在直隸（河北），由香檳省的法籍耶穌會士管轄。郎主教開始接管時，只有三位司鐸，他們尋獲了9,475位教友，全都是在一個世紀前領洗者的後裔。後來該區又被劃分，即後來所熟知的獻縣。它的發展多半是在鄉間，他們的收獲確實不小，因此在十九世紀末葉，比最初的教友人口數字，已增加了六倍之多。蓋了幾百座小聖堂，教育日漸發達，國籍神職班的成長也很有希望。

在二十世紀初，義和團拳匪作亂時，

他們遭遇的迫害和英勇抵抗的事蹟，贏得了一致的好評。致命者精確而詳細的數字為3,714人，其中有兩千人為列入真福品之事，曾詳加調查過。其中有四位法籍耶穌會士：路懋德神父（Fr. Modeste Andlauer）、趙席珍神父（Fr. Remi Isore）、任德芬神父（Fr. Ignatius Mangin）和湯愛玲神父（Fr. Paul Denn）；五十二名男女教友，包括一個十四歲的英勇女孩，均已被教宗碧岳十二世列入真福品，2000年被若望保祿二世宣聖。上述的前兩位神父在武邑被用劍刺死，當時他們正在做彌撒，因而死於祭台下，他們的





二十世紀在義和團所引發的暴亂和死亡中開啟，有數千的天主教徒殉難。其中包括耶穌會士最為崇敬的殉教四聖人：路懋德神父（Modeste Andlauer, 1847-1900）、趙席珍神父（Remi Isore, 1852-1900）、任德芬神父（Ignatius Mangin, 1857-1900）、湯愛玲神父（Paul Denn, 1847-1900）。

首級被掛於城門外示眾，這件事發生在1900年6月。次月，任德芬和湯愛玲兩位神父，當拳匪到來時，他們正在朱家河教友村中，拳匪因受到抵抗而被激怒，忿而攻擊他們，本來教友們可藉由背教而保全性命，但他們

仍遭到大屠殺。殘存下來的人留在聖堂裡，神父在堂中為他們放大赦，並勉勵他們維護信德。拳匪衝進堂裡，四處點火，擊打神父和教友，最後終於把聖堂焚燬；凡躲在堂裡的人，連同神父在內，都被活活燒死，跑出來的則遭到殺害。兩年後，拳匪之亂已接近尾聲，卻另有一位耶穌會士羅彌萊神父（Fr. Lomuller）被殺死。

這種驚人的教難，由於信友們的表現異常忠貞，使它成為值得後人紀念的一樁史實，他們寧願接受任何酷刑，也不肯背棄信仰。他們的勇氣，使他們榮獲和早期羅馬教難時、致命的英勇信友一樣的光榮。在此次教難中，616座大小聖堂，381間學校和3座學院隨之被毀。但在這次教難過去之後，正如今日常見的情形一樣，皈依者的人數更多，二十五年後，天主教友的人數已超出十萬。

在這一教區中最卓越的成就，是創辦了一間工商學院，時值二十世紀初，地點是天津；逐漸發展到與上海的震旦學院平行，終於獲得了大學地位。與此有關的是北疆博物院和研究院，德日進神父（Fr.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曾在天津工作過，也是由此開始他的旅程，並因此有了著名的地理和人類學的發現。這一教區也有漢學家，其中最有名望的要推顧賽芬神父（Fr. Seraphin Couvreur），他曾編過字典，翻譯過中國的古典文學；戴士勸神父（Fr. Leo Wieger）是中國語言書籍的作者。他們的修道院，曾培植出來很多位中國神父，並設有耶穌會的初學院、文學院和哲學院。

在上面已提過，從復會後的初期，各國的會士加入了法籍神父的行列，雖然教區是屬於法籍神父，但他國會士的人數逐年增加，終於把中國的各教區，託給其他國籍的



德日進神父（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圖右三），因「北京猿人」的發現而聞名，於今則因他的著作更受推崇。

耶穌會省管理。經常會選派一組神父，由幾位輔理修士隨從，到中國其他耶穌會教區工作一段時期，直到獲得了足夠的經驗後，在適當的時間，這一組新人可組成一個新的教區，負責一塊很大的土地。之後在傳信部認可之後，便可升格為宗座監牧區，或宗座代牧區。

起初南京代牧區不只統轄整個江蘇省，



中國被劃分為多個傳教區，分別由不同的修會和不同國籍的傳教士管理，安徽蕪湖傳教區由西班牙卡斯蒂亞省的耶穌會士負責管理（照片攝於1946年）。

而且還管理其鄰省安徽。最後該省終於與它脫離，於1921年，分與卡斯蒂亞（Castile）省的西班牙籍耶穌會士。他們當中又有屬於西班牙另一省萊昂（Leon）省的耶穌會士，也分到了另一塊地方，這裡在1929年便成為安慶代牧區。既然安徽省不只有一個教區，那麼卡斯蒂亞省的神父，便將所轄教區名稱改為蕪湖，整個工作的中心，都集中於該城附近。安慶和蕪湖這兩個代牧區，注重實際教育，特別致力於培養青年人的專長技術。杜林（Turin）省的義籍耶穌會士，也和西班牙

人一起工作，直到1929年，也分得一部分地區，後來成為蚌埠代牧區；羅馬省的耶穌會士，也在這裡與他們并肩工作。

從南京代牧區還分出了另一部分，即海門；交與中國教區神職人員負責，但其首任主教朱西滿蒙席，卻是一位耶穌會士，他曾在那一個堂區工作許多年。他是1926年，在羅馬由教宗碧岳十一世祝聖的六位國籍主教之一。



耶穌會士朱西滿主教負責梵蒂岡交託給國籍「教區神父」的區域，他是1926年在羅馬由教宗祝聖的六位國籍主教之一。

後來法籍加拿大的耶穌會士，也前來中國工作。他們是由南京代牧區訓練出來的，與法籍神父協力工作；然後被派到徐州，徐

州在1931年晉升為宗座監牧區；四年後改為代牧區。

美國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最初活動，是起於1931年，一些從加利福尼亞省來的會士，在上海開辦了一間金科中學。由一位國籍耶穌會士出名負責，這樣才可獲得中國政府允准立案。校中專供學生使用的小堂，是聖聶思·公撒格本堂的前身。日後同一省的美籍耶穌會士，兼管了上海的另一座本堂區，即基督君王堂。他們也在上海代牧區的揚州工作，在南京城裡開辦了弘光中學，並附帶建立了一座聖堂。

公元1913年，葡籍耶穌會士抵達廣東省的肇慶，為恢復那已中斷了一個半世紀的傳教事業。讀者應還記得，就是在這座兩廣的都城裡，為以後的利瑪竇和他的同伴，首次在中國有了他們的住處，並在此開始鑽研中



美籍耶穌會士在上海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於1931年分到揚州教區。圖為索騰（James Thornton）神父在揚州教導孩子。

國禮俗，為以後的傳教事業獲致成功，奠定了基礎。

因了這早期的關聯，肇慶與其近郊，在利氏繼承者的心目中，總占據著一個特殊的地位，在以後的年代中，便有了傳教士工作的正規紀錄。那裡可稱為廣東省西部傳教事業的活動中心，有永久的寓所、聖堂。當天主教在成長的那些年中，全國各地教難此

起彼落之時，該地也屢遭蹂躪，其中最甚的是在1650年滿人入侵時，但過了二十年後，廣東省的教友人數已超出了六千人，再過兩年，兩位耶穌會士到肇慶工作，視那裡為他們的基地，在廣州和佛山修建了聖堂。當滿清成立但尚未掌握南方的整體實權時，有幾位耶穌會士，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奧國人瞿安德神父（Fr. Koffler），伴隨著明朝的皇族教友，在廣西居住了一段時間，他是曾

在肇慶工作過多時的司鐸之一。在耶穌會解散前，最後提到的神父，是羅培神父（Fr. Caetano Lopes），他是在1732年抵達的。在肇慶工作的傳教士，大半都是從澳門前去的葡籍神父，但到了1773年，耶穌會被葡國政府從葡國及其屬地驅逐時，這種情形便不再了，澳門的耶穌會神父，也都必須撤離該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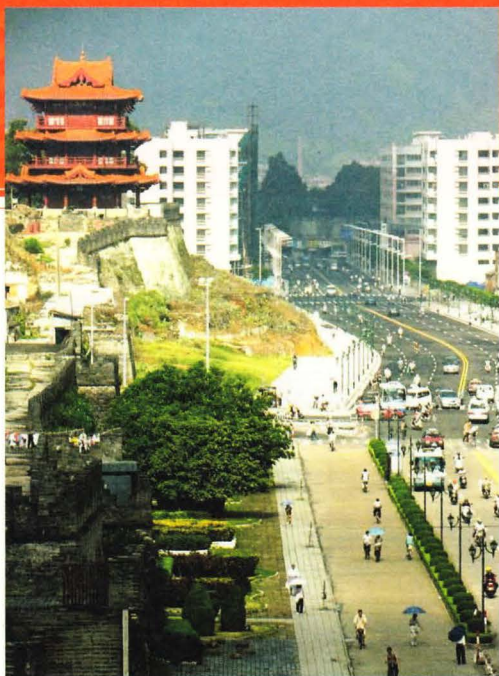
直至1840年代，信仰自由的命令下達，再次使傳教事業復甦，有幾位澳門教區的神父到了廣東，在此以前，肇慶教區的教務一無所聞。之後，他們發現有幾位熱心的中國神父，在肇慶教區工作，信德才得以在鄉間保存，雖然在市區彷彿已看不到天主教徒，唯有兩個城郊區例外，因為那裡曾是癩病患者的居處，幾個住在那裡的後裔，還保持著信仰。



肇慶是利瑪竇在中國的起點，因此，無論對利氏或其後繼者都備感親切。

到了1890年，幾位葡籍的耶穌會士接受主教的要求，返回澳門，起初在修院中執教，過了幾年便負責管理修院，並在城裡從事正規的宗教活動；以後又有幾位英籍、美籍和奧籍耶穌會士到修院教書。但在1910年，他們全部遭到同樣的待遇：必須撤離該城，因為當時葡國政府和其屬地再次驅逐耶穌會士。

在十九世紀重劃中國教區之時，法國



經過戰亂與教難後，肇慶市區已不再有基督徒，唯有在鄉間發現有天主教徒。

的外方傳教會得到了廣東省，但海南島不包括在內，因為它已屬於澳門教區的一部分。1903年，澳門同意把海南島劃歸法國外方傳教會，但需把肇慶監牧區劃給澳門，作為交換條件。自那時起，葡籍和國籍的教區神父，便開始管理肇慶聖堂。當耶穌會士被逐離開澳門，要到印度傳教時，澳門的主教卻設法將他們召回，送往這個中國地區工作。首批五位耶穌會士，是在1913年6月改道（避免途經澳門），抵達了肇慶，距利氏

初次定居那裡整整三百三十年。其後幾年，他們仍繼續在該處工作，有幾位國籍耶穌會士，和許多教區的國籍神父，也與他們并肩發展教務。他們在市內辦了一所中學，並在西方數哩之外靠近西江處，開辦了一所男子工業學校。在鄉村地方的探險中，他們仔細查尋幾世紀前，早期傳教事業的相關跡象，結果找到許多仍保持著信德的基督徒，這都該歸功於國籍神父們的服務精神，遺憾的是，他們的名字多半已被遺忘。

1930年，澳門的耶穌會士受邀在教區的聖若瑟修院執教並擔任神師。當時，耶穌會買下離修院不遠、聖奧斯定教堂隔壁的「芙洛別墅」（Villa Flor），起初為支持教區的傳教工作之用，後來成為被逐出中國境外的耶穌會會士居住的地方。1940年，駐肇慶的會長，羅芳望（Joao de Deus Ramolho）神父，被祝聖為澳門主教。

1953年已有六位會士住在「芙洛別墅」，他們分別在三間小學為當地和來自中國的學生服務。位於聖若瑟修院旁的利氏社會服務社，有來自中國北方的會士（中外籍皆有）為難民、貧困者和有需要者服務，這



這是聖若瑟修院的教堂，多位耶穌會士受邀在此修院任教並擔任神師，不遠處，有聖奧斯定教堂和芙洛別墅。

些會士於1966年加入耶穌會香港傳教區；其餘的葡萄牙會士和中國南方的會士則於1982年加入澳門香港省。

在兩次世界大戰間，最後派遣到中國的耶穌會士，是屬於愛爾蘭省的。傳信部把江蘇省南京以南的地區，撥劃給他們，在該地可與他們的法籍同會弟兄共同合作。一切均已準備妥善，只等待出發的命令時，忽然有了一個大的轉變：新任香港代牧區的主教，請求派遣會講英文的耶穌會士，到英國殖民地輔助教育事業，故此愛爾蘭的耶穌會士們就被派往香港。這為他們不啻是一件非常令人失望的事，因為在歐洲眾所周知，侵略霸占的殖民地，根本稱不上是什麼傳教區。然而，他們得到了保證，等過一段時期，一定由廣東省內撥給他們一個「真正」的傳教區，該地正缺乏神父。他們是在1926年末抵達香港的，兩年後，由於廣州代牧的申請，

他們當中便有一部分人前往廣州幫忙教務工作。

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於1929年啟用，首批宿生有三十五位，那時有五位會士與他們同住，其中有幾位會士在該大學任教。當時大學的學生有四百多位，大部分來自公教家庭和公教學校。因此，利瑪竇宿舍逐漸成為大學的天主教學生的生活和活動中心。

由於耶穌會在香港大學的服務深獲好評，於是一間名為華仁的學校，邀請會士任教該校高中生的英文，希望增加學生考進香港大學的機會。華仁書院位於香港教區總堂旁，地方是向主教租借的，並且獲得政府的津貼。John Neary神父在其他會士抵港後，馬上探訪華仁書院，並寫信給愛爾蘭省會長，大力推薦該校為會士工作的園地。1933年耶穌會接手華仁書院，並且以學術成績出

眾為名。當時的會士渴望投入中國人的生活圈子，而這所學校正提供了一個好平台。此後，社會人士都將耶穌會和華仁書院相提並論。事實上，香港的耶穌會會士大都住在香港和九龍的華仁書院。

位於香港鴨利州的華南總修院於1931年成立，耶穌會在港早期歷史中的另一個重要發展就是受邀於該院任教和管理。1924年首屆中國主教會議決定成立十多個地區性修



在一般人心目中，香港華仁書院幾乎與耶穌會在香港九龍的工作劃上等號。

院，為培育本地神職人員，希望能成立中國聖統制。自1932至1964年，超過五位神父在華南總修院任教，其中一些修生將來更成為中國主教，包括香港第一位樞機：胡振中樞機主教（於2002逝世）。

直至1955年，每年都有多至五位的年輕愛爾蘭會士到港服務。會士的工作多姿多彩：從大學、中學教育到司鐸培訓，加上主日在教區和各堂區服務，推動教友生活和參



具有中國宮廷建築風格的華南總修院，對於本地化神學貢獻良多。

加文化活動更不在話下。可是，還是有點遺憾：愛爾蘭會士沒有在中國大陸工作。

耶穌會抵達香港兩年後，法籍的廣州主教，於1928年邀請耶穌會士任教於廣州的聖心書院。愛爾蘭會士對中國情有所鍾，準備在大陸創建一個文化學院，從事教育工作和發展一些堂區服務。雖然當時的政治和經濟都不太穩定，但會士們仍然有機會在廣州總堂學習廣東話和中國文化。可是，1932年兩位出色會士的相繼去世令愛爾蘭耶穌會決定退出中國大陸。1936年在香港成立了為學習廣東話的羅耀拉語言學校。

這便是在1937年日本軍閥侵入中國時的一般情形，中日戰爭爆發後的數年，又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既然在中國的耶穌會士有著各種不同的國籍，因此他們的傳教工作也因所在的地區而有所差異，完全視所在



1949年之後，所有的外國傳教士逐漸被驅離中國大陸，他們和中國耶穌會士避往台灣、越南、菲律賓、泰國等地。這些耶穌會士一同組成耶穌會遠東省。

地的統治當局視他們為友、為敵，或採中立而定。各種傳教工作難免要遭到挫折，一切的希望都集中於戰爭結束後一個新紀元的開始。而這新的希望好似就要實現了，因為在戰爭結束時，中國曾列為世界五強之一，決心建立一個進步的、現代化的民主國家，保障信仰的自由，也歡迎教士們前來。由於經過幾年艱苦的抗戰，教士們對中國人民的

誠摯忠實早已毋庸置疑。隨著時間的改變，有些中國禮俗一度被認定含宗教意味，如今則被視為純粹的公民禮儀，聖教會在1939年的12月，撤銷三個世紀前的禁令，教友可依傳統的方式敬禮死者和尊敬聖賢——祭孔。1946年4月，聖統制建立了，遠大的方針也確定了——擴展教會在社會以及宗教學術上的推進。

1949年大陸政權變色，許多以前曾在中國大陸工作過的耶穌會會士，如今大部分被派往台灣工作，在那裡逐漸有中國會士和他們并肩耕耘；那些會士在大陸變色前，正在國外讀書或從事其他工作。他們一同組成包括台灣、菲律賓、越南、泰國在內的遠東省，擁有堂區和會院，並且在葡國教區澳門和愛爾蘭教區香港，也有臨時寓所。當耶穌會的遠東省成立時，總共有500位會士，其中司鐸占了400位。

捌 VIII. 二十世紀後半葉

香港

1945年8月之後，隨著日軍的撤退，香港開始踏上繁榮發展之路。大量的人潮從中國湧來，其中不少是教友。此時，許多外資也協助香港教區的發展，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政府有利天主教機構工作和發展的政策。



位於長洲島上的香港靈修中心思維靜院，是年輕的愛爾蘭籍耶穌會士投入的工作之一。

例如：兩間華仁學校得到土地批准來擴建校舍，又獲得經濟上的支助；很多其他的學校和社會工作都得到諸如此類的支援。

包括耶穌會會士在內，大家都抱著莫大的熱忱工作，也感受到被重視和肯定。香港從一個中國的小港口，逐漸演變成世界級的城市，而會士們在其間與香港一脈相連。當時的會士大部分都年輕力壯而且博學多才，他們可以配合當時的政策：幫助市民謀生和尋求一個更為人道的生活。當時，有很多人要求領洗，從1950至1960每年平均有4000位候洗者。那時候，耶穌會會士們無孔不入：從房屋社團到獄犯更生、教育高層委員會、借貸協會和教區的種種服務，包括明愛中心的大眾福利、天主教婚姻輔導，甚至當地影片的製作等等。

勞達一 (Laszlo Ladanyi) 神父自1952

至1989年出版的「中國新聞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受到國際的賞識；彭光雄(Alan Birmingham)神父擔任香港教區公教報編輯三十年。每星期出版的公教報在香港，甚至在東亞區的天主教範圍內，都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從1950至1965年，有會士在大學執教，自1972至1994年中文大學的湯若望宿舍，亦由耶穌會管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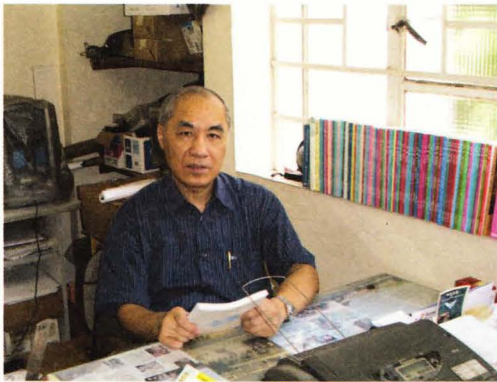
1970至1972年，劉勝義(John Russell)神父被邀為教區會議的協調人，該會議目的是在梵二光照下，與教友們一起更新教區。然而，同一時期，很多年輕的神父和修士離開耶穌會，大大打擊了將來會士的生活和工作。

香港的耶穌會士，40年來，都是愛爾蘭省的傳教「分支」，直至1966年12月，他們九十多位會士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副」會



在中國大陸的訊息完全中斷的年代，自由世界十分仰賴勞達一(Laszlo Ladanyi, 1914-1990)神父所出版的「中國新聞分析」。

省。1964年當最後一位愛爾蘭會士抵港時，陸續來港的會士共計已超過106位。當時的目的是栽培本地人，希望他們能夠繼續已開始的工作。1958年在長洲成立了初學院，首批初學生多達十二位。1971年初學院暫告一段落，唯一的初學生前往馬尼拉繼續初學。1976年另一新的初學院在馬來西亞成立，首批初學生有六位。實際上，長洲一半的初學



吳智勳（Robert Ng Chi-fun）神父主編神學季刊也寫下許多的著作。

生是來自馬來西亞的。

近年來有另外兩個創舉：吳智勳（Robert Ng Chi-fun）神父於1988年創辦一本中文的神修動向和神學季刊，有其獨特之處。嘉理陵（Sean O’Cearbhallain）神父自1973年推動基督生活團，又於1988年，與方濟會、慈幼會和天主教聖經學院共同為平信徒籌辦晚上進修的四神、哲學文憑課程。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看到1930至1950年的年輕愛爾蘭會士在靈修培育和文化活動所結出的碩果。在香港的英國政策下，他們為普羅大眾的福利工作，並且為他們付出信仰的服務。到了1964年，再沒有愛爾蘭新血加入，只有數位香港的會士。香港在搖身成為國際大都市的大前提下，滲入了一種新的世俗主義。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人心恐慌。現在回歸後十年，香港在中國高速發展的經濟中高居首位，而香港的教會也有相當

的發展。

在過去的數十年，香港會士謙遜的生活、喜悅的服務、尊重愛護港人和對中國大陸的開放，可謂激勵人心。



牧育才（Edward Murphy, 1912-2005）神父是到台灣來的第一位耶穌會士，他於1951年抵台，除了牧靈工作外，他也受聘至台灣大學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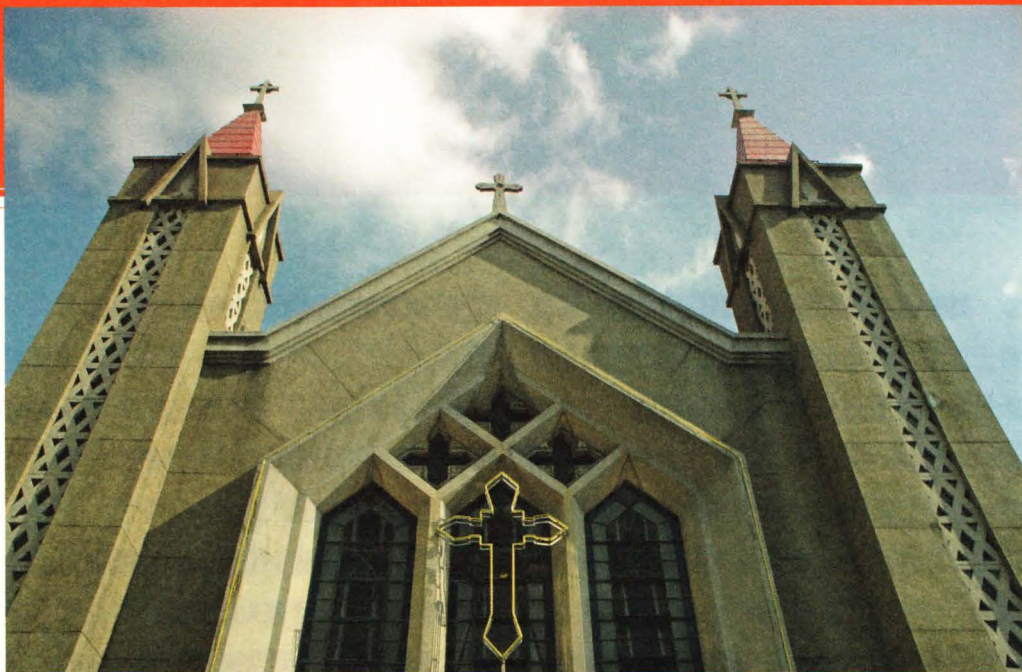
台灣

走向一個耶穌會省1951—1970

殷保祿神父（Fr. O'Brien）1951年開始派遣被逐出中國的會士到東南亞和拉丁美洲從事新的工作。此年牧育才神父（Fr. Edward Murphy）於11月23日受聘到台灣大學執教。牧神父是到台灣來的第一位耶穌會士。

1952年，會士們各按天主給的天分和機會，開始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在澳門陸毅神父（Fr. Luis Ruiz）開始他救助難民的工作，以後迅速發展，直到今天。冉神父（Fr. Begin）在台北市建一座小聖堂，幾年後重建大堂，至今還是台北市最大的聖堂和堂區。

到了10月有兩件重要的事發生：一是羅



新竹縣市是大陸耶穌會來台最早的落腳處。圖為新竹市最大的教堂，由美籍耶穌會士所興建，後來交予新任的中國主教，更名為「聖母無玷聖心主教座堂」。

馬聖座透過台北總主教把新竹地區劃給耶穌會開發，以從事福傳工作。不久，大陸楊州的代牧費濟時蒙席 (Mgr. Fahy) 來新竹，策劃建立新教區。另一件重要的事是中西多語言大辭典工作小組由澳門移至台中，繼續編纂大辭典，亦為未來的光啟出版社鋪了路。這兩件事當時尚不知其後果，但以後會漸漸顯露出來，一在福傳和牧靈領域，一在文化界和知識界。



歷經多年的變遷，光啟出版社1957年正式登記，2002年易名為光啟文化事業，是台灣文化界的一份子。

1953年新竹縣市為被逐出大陸的耶穌會士成了大陸耶穌會傳教區的縮影。楊州到新竹市，安慶到竹東，蕪湖到新埔，蚌埠到湖口，獻縣到芎林，上海到北埔，徐州到關西，景縣到新竹市光復路。這些傳教區從前都由分散在歐美各國的母省接受豐富的經濟援助（每省成立所謂的coetus），現在這些資源匯流到台灣的一個縣市，可預期其進一步的發展及其成果。首先是1954年3月28日耶穌會在台灣建造的第一座聖堂，在竹東祝聖啟用。此堂命名為無原罪聖母堂，為紀念聖母無原罪信理欽定百週年，1854-1954。

1958年年底，耶穌會遠東省有成員710人，一座神學院在碧瑤，一所華語學院在新竹，一所宗座大修院在越南，二所中學，氓市的光啟和廬州的徐匯，一所高工在新埔，18處會院，44個福傳站。

多彩多姿的遠東省1959-1968

1960年5月1日，彰化靜山的五層新大樓祝聖啟用，作為耶穌會初學院和退省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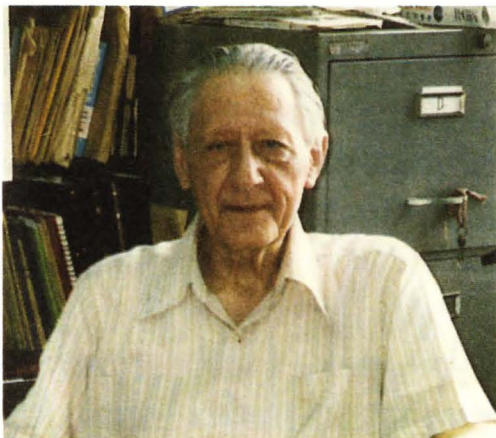
6月22日耶穌會和聖言會在羅馬簽約，共同與中國神職合作，以促成輔仁大學在台復校。此合約也得到聖座的批准。



彰化靜山建於1960年，位於台灣中部，是耶穌會的初學院和靈修中心。

1963年10月8日，台北市羅斯福路耕莘文教院正式開幕。

1965由柏神父（Fr.Palm）新建的耶穌聖心堂採用中國式建築，三座圓形的聖堂分三進串連起來，一進比一進小，最後第三進小而神秘，在幽暗中供奉著至聖聖體。前兩座較大的堂，入口的一座最大，供主日和慶節



甘易逢（Yves Raguin, 1912-1998）神父於1966年成立利氏學社；甘神父本身精研神修學，對東方靈修尤有獨到見解，著作等身，其著作既深邃又精闢。

之用。第二座較小的堂為舉行平日彌撒。堂頂外蓋著琉璃瓦，堂頂內掛著多盞宮燈。

1966年7月，法國籍甘易逢神父（Fr. Raguin）宣布成立「利氏學社」（Ricci Institute）。

1958到1967年，耶穌會在台灣發展的情形：建立了25座聖堂（包括宿舍和福傳站）；18所文教或學生中心（以從事知識傳教）；給10,474人付洗。

1968年遠東省耶穌會會士分布的情形是：大陸123名，香港6名，菲律賓40名，越南52名，泰國13名，台灣291名，在其他會省198名。

遠東省改名為中華省1969-1978

1969年輔大神學院《神學論集》季刊由台中光啟出版社發行。第一期創刊號有輔大校長于斌總主教的發刊詞，有台北總教區主教羅光的前言。二人對一份中文的神學雜誌都寄以厚望。香港的真理學會主任，徐成斌主教，看過第一期後，也表重視，願與台中光啟同做發行人，每期多印600份，專為在港澳銷售，至今如此，為教會出版事業樹立



輔仁大學神學院對中文神學極具影響力，於1969年創刊的季刊《神學論集》，對中文神學的研究和發展有著十分卓越的貢獻。

了一個典範。至2007年，這份神學刊物已出到150期，以每期150頁計算，38年來，用中文寫神學，已寫了二萬二千五百頁。再以每頁700字來算，150期共有一千五百七十五萬字。《神學論集》創刊後十年（1979），中國大陸局部開放，教會書刊循不同管道得以輸入，使得輔大神學院的辛勤耕耘也能在大陸各修院收穫成果。

1973年6月21日，朱蒙泉神父被任命為中華省會長，前任會長朱勵德神父則擔任「中國研究代表」（Delegate for China Studies）。



神學院出第一冊《輔大神學叢書》（Fujen Series Theologica），至目前（2007年）已出到第80冊，可當作一種新式的神學教科書使用。例如第76冊穆宏志神父所著《新約中的耶穌畫像》及第77冊吳伯仁神父的博士論文《拉內神學的靈修觀》都是聖經、神學、靈修各門課的有用參考資料。

1976年元月6日，利氏學社在台北出版中法辭典，內有單字6,031個，詞句或說法約45,000條。基督生活團（CLC）方面，在34所大學或學院成立了35個團，其中有多位耶穌會士擔任輔導。12月，《西漢綜合辭典》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出版。

1978年底，中華省會士共568人，444位司鐸，94位修士，30名讀書修士。1969-1978十年間，中華省減少180人：94人過世，39人移轉其他會省，49人左右出會。

中華省與普世互動1979-1988

單國璽神父於1979年被任命、1980年2月被祝聖為花蓮教區主教；1991年出任高雄教區主教，1998年升為樞機主教；並出任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長達18年。



單國璽樞機（Cardinal Paul Shan Kuo-Hsi, S.J. 1923-），1998年升為樞機主教；並出任台灣地區主教團主席長達18年。

1980年，朱蒙泉神父受命擔任「中華使徒工作」（Chinese Apostolate）省會長，同時雅魯伯（Pedro Arrupe）總會長成立港澳獨立會省。

1981年6月22日至8月16日，加州一位神



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是一廣播、電視節目以及多媒體製作中心，創立於1958年，與台灣早期的電視發展息息相關；它所製作的娛樂性節目和社教節目同樣受到歡迎。

父陪同12位讀書修士來台灣，與中華省合辦夏令營（Taiwan Summer Program），以認識中國文化，探索來日在華工作的可能。

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KPS）啟用十層的新大樓，作為TV錄製中心。其時，KPS有120名員工，每年錄製約500套半小時的電視節目。

1983年5月1日勞工節，台北「新事勞工中心」成立，其目標是推行社會正義，及協調勞資關係。

輔大神學院舉辦第12屆神學講習會，討論教友在今日教會使命中的角色，有16位神父，20位修女，和30位平信徒參加。直至2006年，神學院辦過30屆神學講習會，講習內容（演講與討論）都在《神學論集》中發表過。最後二屆的主題是「感恩聖事」



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於1988年成立，之後進一步成立宗教學系，致力於宗教研究，是台灣第一所宗教研究所。

（2005）和「梵二40年來的回顧」（2006）。

1988年9月20日，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在校長羅光總主教大力推動及法學院院長袁廷棟神父的支持下，由神學院策畫成

立，房志榮神父任首任所長，招生開課。經費方面，由耶穌會主辦的法學院予以支援。這是中華民國教育部承認的第一座宗教研究所，四年後將發展為宗教系所。不久以後，台灣的其他大學，尤其是佛教辦的學校，也紛紛成立宗教系所。

中華省重組1989-1999

1991年中華省與港澳副省，大陸地區，耶穌會中華服務部（Jesuit China Service）合為一個會省。張春申神父任省會長，張宇恭神父任台灣區會長，勞伯壘神父任港澳區會長，華澄濤神父任中華服務代表。

1999年依納爵靈修中心在耕莘文學院成立，其成員為5名耶穌會士，一位修女，一位女祕書。本年年終，中華省耶穌會士有240人：神父205人，修士24人，讀書修士11人。

中國大陸

如上所述，二十世紀後半葉，香港、澳門和台灣的耶穌會士們的工作發展模式，其實相當相近。他們所處的社會和政治環境雷同，相似的背景使得他們著力的方向也近似。但另一方面，在共產體制下的中國大陸則是截然不同，幾十年下來，只剩下中國籍耶穌會士留在大陸。

自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之後，幾年之內，他們便驅逐所有的外國傳教士。1951年，驅逐教廷公使黎培理（Msgr. Riberi）總主教出境，全面斷絕與教廷的外交關係。至於國籍耶穌會士，包括神父、修士、主教在內，都被長上們要求留下來和他們的羊群在一起。對當時無數困難接踵而至的教會而言，這是絕對必要的。而仍在培育中的國籍耶穌會士則被送往菲律賓，完成培

育後，派往台灣、香港、澳門和海外的華人團體服務。

1950年起，共黨政府推動教會「三自」運動，也就是建立自治、自養和自傳的教會。換言之，就是要全面切斷與教廷和西方世界的聯繫。對於那些反對中國天主教會「三自」的人，中國政府的反應十分激烈。以上海為例，1955年9月8日，數百位神父（包括許多耶穌會士）、修女、平信徒以及龔品梅（Msgr. Joseph Kong）主教，遭到逮捕入獄。兩個星期內，總共有1,200人被捕。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在歷經長期監禁或各種勞改，如下放到偏遠農村或礦區勞動，在長達四分之三個世紀之後才獲得釋放。

1957年，「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在北京成立了，其意在監督並控制中國天主教會，以確保它完全的獨立自主。隔年，依照愛國



1950年起，許多耶穌會士被捕入獄、下放勞改。

會的新政策，在未取得教廷的同意下，自選自聖了兩位主教。此例一開，多年下來祝聖了許多「不合法但有效」的主教——不合法是因為未取得教宗的同意；而所謂的有效，

是指假如是由宗徒承繼者的主教所祝聖者，那麼他的主教身分是有效的。

1966年至1976年，中國掀起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感到他的路線不被重視而有喪失共產黨內主導權的憂慮，於是發動了這場運動，喊出「破四舊」的口號——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由學生組成的紅衛兵推波助瀾之下，造成文化和社會上極大的動盪。紅衛兵砸毀、破壞具有文化價值的文物古蹟。天主教會和其他宗教不僅被禁止，而代表著過去的標誌，如教堂、醫院、學校等，也和許多的佛寺和孔廟一樣遭到大肆摧殘。在那樣的時代，耶穌會士不可能過團體生活，每一個都是獨自度著耶穌會士的生活，無論他們是在牢獄之中、在他的家庭裡或是真正的獨自一人。

1976年毛澤東逝世，噩夢般的文化大革

命終於落幕，接下來的中共領導人立場漸趨溫和。1980年，鄧小平帶著他的改革開放政策重回政壇，不那麼重視於政治，而是全神貫注在經濟方面，一個較為自由的新紀元也因此開啟。大多數遭到逮捕或軟禁的神父、修女、平信徒都得到了釋放。自由之後，他們卻面臨困難的抉擇。愛國會依舊存在且深具影響力，結果，每一位天主教徒都必須下定決心，是要選擇可以自由從事信仰活動（當然是在愛國會掌控之下的自由）而成為官方教會的一員；還是選擇真正的自由，和羅馬教會完全的結合。一旦選擇後者，就必須躲躲藏藏，在私人家庭中參與彌撒，而彌撒是由來自於地下教會的神父所主持。

似乎大部分的耶穌會士選擇支持地下教會，即便處在較為自由開放的年代，他們仍必須在家庭教會中主持彌撒。

八〇年代初期被釋放出來的神職人員中，有些選擇公開其信仰活動，因此有必要加入愛國會之下，他們嘗試走在鋼索之上，希望同時效忠於教廷和愛國會，愛國會給予他們較大的自由，但仍堅持教廷不應干涉國家內政。以下是一個耶穌會士的實例——那就是選擇成為官方教會一員的現任上海教區總主教金魯賢。

和1955年9月8日許多被捕的人一樣，當



金魯賢主教（圖左）與被祝聖為上海教區輔理主教的刑文之主教合影。

時的金神父被監禁長達27年。1982年獲釋時，他發現紅衛兵摧毀了他晉鐸時的聖依納爵堂的兩座尖塔和彩色玻璃。但是，他也注意到這座教堂每逢週日總是有滿滿的教友。他認為上海需要一個能夠自由從事教會活動的神父，關心那群公開宣稱他們的信仰並堅持到最後的基督徒。他立即被指派接任將近三十年前他被捕時的職務——佘山大修院院長，由於考慮到中國神父的不足，他十分重視這一個職位。他付出全副心力培育年輕人，教育未來的神父。1988年，上海教區由愛國會任命的主教張家樹病逝，金魯賢神父獲選為上海教區主教。不過，地下教會的范忠良主教仍是由教宗正式認可的上海教區主教。

另一方面，代表拒絕官方教會的耶穌會士，我們也可以舉出許多在八〇年代獲釋的神父為例，但為免他們遭到報復，我們不願

意透露這些已經年邁的耶穌會士的名字。因為愛國會不承認梵蒂岡選派主教的權利，至今，他們仍無法接受它的管理。

當金魯賢神父任佘山大修院院長的時候，他多次向愛國會提出申請，最終獲准自國外聘請教師（大部分是耶穌會士），在修院中任教。在此先例之後，准許多位來自香港和台灣的耶穌會士教授，甚至於同意前外國傳教士再次回到中國，幫助教區培育未來的神父。但當某一個神學領域出現一個優秀的本地學者的時候，這些外國客座教授將不再被延請在修院授課。

在全中國各地的修院，對於邀請外國客座教授任教一事，變得十分頻繁。不久，許多耶穌會士也被邀請至中國各地的各宗教團體作演講和帶退省。最早服務的對象主要是官方教會的成員，但逐漸地也提供給地下教

會的團體。

在中國某些地方，兩個團體間的對抗是日漸微弱的，或許是因為當地政府不再迫使地下教會保持沉默，或者是因為聖神使得基督徒更加了解另一方的立場。

當此書出版之際，教宗本篤十六世最新發表致中國天主教徒的牧函，為我們帶來極大的希望。在現代史上，這是羅馬教宗第一次直接針對一個國家發表信函。從兩個「教會」對信函的第一個反應看來，很有希望看到它即將結出美好的果實，並進而在中國大部分的地區共同舉行感恩祭。期盼這兩個團體能透過舉行聖體聖事，與羅馬教廷共融並進一步團結在一起。

除去中國教會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和困難外，中國教會成長的現象帶來極大的希望，

幾乎可以稱得上是神奇的進展。當中國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之時，中國的教友人數約3,000,000人，現在據說是12,000,000人，甚至可能達15,000,000人，無論如何這個數字仍在繼續增加之中。這是對靈魂巨大的渴求，也是對吾主耶穌的強烈追尋。在看過中國教會所遭受的迫害，我們不由得想起戴爾都良在羅馬帝國的迫害中所說的話：「殉道者的血液是基督徒的種子」。

在結束二十世紀後半葉耶穌會士在中國大陸的概況後，以下是耶穌會在一個新世紀之初所做的一些事情。

除了所有英勇貢獻、毫不妥協的國籍耶穌會士難以詳細報告外，我們曾提及從香港、台灣和美國來的耶穌會神學教授，在中國各地的修院中做短期神學教學。此外，在香港和澳門有一個由耶穌會士、修女和平信

徒組成的團體，為神學院的學生、神父和修女們舉辦退省活動。

跟隨利瑪竇和他的後繼者的步履，有許多耶穌會士在學術領域中活躍。

乘著耶穌會大學國際網路之便，耶穌會得以聯結上許多中國的教育領域。1998年，Fordham大學和其他的美國耶穌會大學開始與北京大學合作BIMBA（北大國際MBA），美國教授來到中國授課而中國學生在北京上課，就可獲得Fordham大學的學位。這裡的MBA（工商管理碩士）被評比為中國最好的MBA之一。

1998年，為美國耶穌會大學的學生成立了北京語言文化中心。由最早的名學生開始，到了2007年已經有120名學生。多數課程是由北京的主要大學的教授授課。北京語

言文化中心也提供一個星期到一個月的課程，給耶穌會的修士和會長以及耶穌大學的教授、學者和管理者，他們來自菲律賓、歐洲、美國和拉丁美洲，希望在這裡學習更多有關中國的知識。

由於中國再次點燃對基督宗教以中國天主教會的興趣，四所利氏學社（台北、巴黎、舊金山和澳門）和許多個別的耶穌會士



10年前，安東神父（Fr. Ron Anton）創立北京語言文化中心（TBC），學生可以在家鄉的大學修習學分並取得學位。

與中國國立大學在教學、研究計劃和出版品等領域進行密切的合作。

2001年，在北京舉辦了慶祝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的國際性會議。2007年，則有兩個會議慶祝利瑪竇、徐光啟合譯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

2003年10月，是第一次在中國舉辦德日



2005年，在德日進神父和桑志華神父有重大考古發現的內蒙古，舉辦了一場研討會。

進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 的研討會，會議地點在北京，由中國科學院、語言文化大學和德日進基金會聯合主辦。另一個會議是2005年8月，於內蒙古德日進神父和桑志華神父 (Fr. Emile Licent, 1876-1952) 有重大發現的地點舉辦。

有些耶穌會士在中國大學教書，短期或長期都有。

2005年，創辦國際商業道德與經濟中心，為商業領袖和學者提供會議、研討會和出版品。

與這些學術貢獻相提並論的，是耶穌會士在社會福利領域的巨大努力與付出。耶穌會士以在澳門和台灣參與的各種組織完善的工作為基礎，為中國南方的癲瘋病患服務。最近則建立了為愛滋病患者的工作站。

今日，耶穌會在中國大陸的年輕人之中，已經出現為數可觀的聖召，而這正是耶穌會未來希望的象徵。





基督的僕人 I ~ IV——個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依納西·艾坎立／著，楊黎芳、尤淑雅、張佩英、譚璧輝／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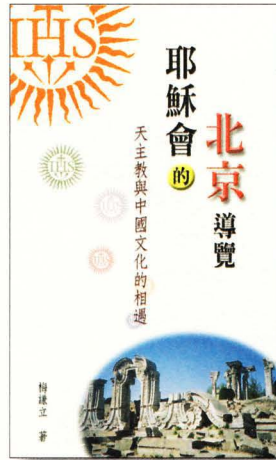
書號：209026-1、209026-2、209026-3、209026-4

定價：(I) 230元、(II) 320元、(III) 200元

本部耶穌會史共分四冊，涵蓋一百多位具代表性的耶穌會士。

在耶穌會四百多年的歷史巨畫當中，繪著各式各樣的人物：有聖人與學者、傳教士與殉道者、知識分子與探險家、巴洛克式音樂家以及創意十足的英國詩人，也有不遵從會規者、廷臣、神視者、闖禍的不智管理者以及從酗酒惡習中起死回生的流行歌手，都在此巨畫中占有一席之地。

本書作者不只提供宏觀的角度，也鉅細靡遺地捕捉現實生活中的每個鏡頭，深入刻畫出一幅真人血淚譜成的耶穌會史。



耶穌會的北京導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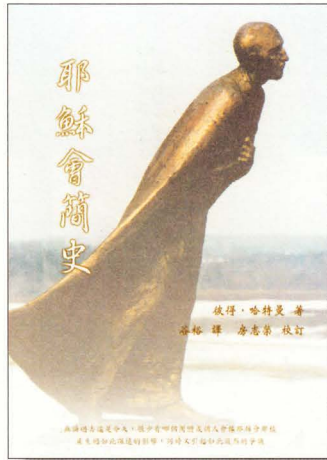
梅謙立／著

書號：209024

定價：200元

這本旅遊導覽是梅謙立神父以耶穌會在北京為主題與人討論介紹的心得總結。不僅為大家提供參觀資訊，地理位置，並收納梅神父個人的思考和靈修看法。

書中介紹與耶穌會相關的十六個地點，在五天之內可以參觀完畢。參觀的順序按照歷史展開，不但考慮到地理位置的方便性，並為每個參觀地點提供有關的歷史背景，以及個人的一些反思與靈修意義，可說是一本深入心靈的旅遊導覽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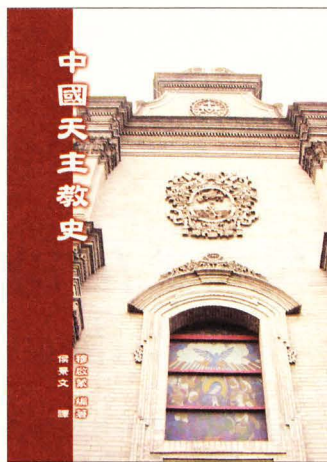
耶穌會簡史（懷仁叢書1）

彼得·哈特曼／著，谷裕／譯

書號：209022

定價：250元

無論過去還是今天，很少會有哪個團體像「耶穌會」那樣引起爭議。但不論如何，耶穌會堪稱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修會。本書旨在向讀者描述耶穌會引人入勝的發展史，即從宗教改革後修會的成立開始，到今天修會發展的概況。其中，修會的文化發展是本書描述的重點。



中國天主教史

穆啟蒙／著，侯景文／譯

書號：209009

定價：240元

本書旨在介紹天主教傳入中國的歷史，其開始時所遇的困難和打擊，在清朝初年所受朝廷的優遇，以後長時間履起履停的教難，二十世紀初期的興盛，以及最後在共黨蹂躪下所受的迫害，都是本書所要記載的史實。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耶穌會士在中國／賴詒恩 (Thomas F. Ryan, S.J.) 著，
陶為翼譯，-- 再版 -- 臺北市：光啟文化，2007.11〔民96〕
面，公分.--)

譯自：Jesus in China

ISBN 978-957-546-611-4 (平裝)

1. 耶穌會 2. 傳教史 3. 中國

248.85

96021365

耶穌會士在中國

2007年11月再版

◎ 版權所有 · 翻版必究 ◎

作者：賴詒恩 (Thomas F. Ryan, S.J.)

譯者：陶為翼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鄭再發

出版者：光啟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 (10688) 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電話：(02) 2740 2022

傳真：(02) 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 (光啟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94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中文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02) 2367 3627

定價：250元

光啟書號209007-a

ISBN 978-957-546-611-4

在那個地理大發現的年代，唯有中國是一團迷霧；而撥開迷霧、一身不卑不亢地走進那一個神祕國度的利瑪竇，不僅敲開了中國長久緊閉的門戶，更搭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西方的科學、數學、地理、天文等知識，就這樣乘著教會的翅膀，飛進了中華大地；而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也隨著傳教士們傳回歐洲大陸。中西文化就如此起了碰撞，並激出了火花。

利瑪竇融入當地文化、尊重在地風土人情的傳教方式，雖然歷經了許多的波折和磨難、痛苦與掙扎，但依舊為天主教會寫下極其精采的一頁；也使得日後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工作開出更加燦爛的花朵。今日，當中國再度向全世界張開雙臂的時刻，或許，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歷史，值得借鏡與省思。

本書是利瑪竇和他的後繼者在中國和天主教會的歷史上，四百年來戲劇性發展的故事。

